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83期（民國103年3月），1-4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逃離城市：明清之際江南城居士人的逃難經歷*

巫仁恕**

摘　要

中國傳統俗諺有所謂「小亂避城，大亂避鄉」，這句諺語出現在明清之際，反映了朝代轉換、兵燹頻仍的時代背景，同時又標誌著一個重要的訊息，就是人們意識到城鄉之間的差異。過去關於這段時期的歷史研究，較關注於政治上層的問題，而忽略下層百姓與個人的逃難經歷。本文擬嘗試從當時城居士人留下來的筆記與日記，來重建明末清初這段逃難的歷史過程。本文指出在晚明一度盛行的「鄉紳城居化」之趨勢，至此逐漸轉向逃離城市，遷居至鄉村避難。過去城居者的驕傲態度不復存在，城／鄉二者的地位出現翻轉。此外，當時親身經歷逃難痛楚的下層士人，他們對抗清運動的看法也不同於一般史書的評價。本文後半部透過這些下層士人所書寫的文本，試圖從社會史、文化史與士人心態的角度來探析逃難時所呈現的社會矛盾、逃難婦女的遭遇與形象、倖存者對抗清領導人的觀感、如何解釋逃難時的不同命運，以及避城或避鄉的爭論等議題。筆者希望藉由他們的逃難紀錄，擺脫明清之際的歷史大敘事，呈現當時戰亂下「逃難社會」的特色。

關鍵詞：明清之際、江南、逃難、城市、鄉村

---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編號 NSC 101-2410-H-001-064 之研究成果，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3 年 8 月 1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3 年 12 月 27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導言：小亂避城，大亂避鄉

中國有句諺語：「小亂避城，大亂避鄉」。這句話源自何典故，至今並未有確切的答案。以筆者所見，此語在文獻中最早見於明末清初的作家李漁（1610-1680）的《十二樓》之〈聞過樓〉。文中作者自陳曾隱居於鄉野的原因：「不虧別人，倒虧了個善殺居民、慣屠城郭的李闖。被他先聲所懾，不怕你不走」。[1]這說明了此句諺語的出現，就是在明清之際朝代轉換、兵燹頻仍的歷史背景下而形成的。其後此諺語又重覆出現在清代中後期的文獻中。例如鄧顯鶴（1778-1851）的《沅湘耆舊集》裡有〈題王孝烈傳後〉，亦載此語。[2]到了咸豐年間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江南的文獻裡提到個人的避亂事跡，也常引用此諺語。如蘇州長洲縣人江文鳳，於當年太平軍興起時由城遷居鄉間之前，也曾言及此諺語。[3]

這句諺語的出現，還標誌著一個重要的訊息，就是在此時人們意識到城鄉之間的差異。在此之前，中國歷史上戰爭頻仍之際，城居住民爲避亂而移居或逃難的情況非常普遍。但在文獻中的敘述是「避居某地」或「避亂某地」，並未言明城鄉之別。明中期以後江南地區不但是帝國的經濟核心，也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明清鼎革之際，江南城市住民面臨到戰爭頻仍的情況下，如何避亂逃難是生死攸關的問題；也在此時留下不少珍貴史料，其中不乏下層士人所撰寫的文獻，而作者大多佚名。

雖然過去關於這段時期的歷史，已有許多重量級的研究成果，但是這些研究的焦點往往鎖定在政治上層的問題，如戰爭的成敗過程、異族的征服過程與

1 〔清〕李漁，《十二樓》（台北：三民書局，1998），卷 12，頁 244。

2 〔清〕鄧顯鶴輯，《沅湘耆舊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鄧氏南邨艸堂刻本影印，1997〕，冊 1690-1693，卷 139，頁 14b。

3 〔清〕俞樾，《春在堂襍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刻春在堂全書本影印，1997〕，冊 1550-1551，6 編，卷 3，頁 18b。

統治方式、士大夫的政治認同與重要的歷史人物之評價等等。[4]近年來除了在文獻方面不斷有新的史料被發掘之外，[5]新的研究趨勢是探討此時期的離散、創傷與記憶。[6]對當時史料的檢視與甄別也愈加精細，進而並考訂史實與傳說之間的落差。[7]然而，過去關於明清鼎革之際的逃難研究相當稀少，僅見關於華北士人與逃難婦女的成果，至於言及當時下層民眾逃難的研究更是付之闕如。[8]本文擬嘗試從當時士人留下來的筆記與日記，來重建明末清初的這段歷史過程；主要是集中在崇禎十四年到順治二年（1641-1645）之間，分爲三個階段來討論江南城市內住民的逃難經歷。此外，當時親身經歷逃難痛楚的下層

4 Lynn A. Struve,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Frederic Wakeman,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Jerry Dennerline, *The Chia-ting Loyalists: Confucian Leadership and Social Chan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南炳文，《南明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上述的研究，係政治與軍事的脈絡爲主軸。關於明季士大夫的政治認同問題，參見王成勉，〈明末士人之抉擇——論近年明清轉接時期的研究〉與〈再論明末士人之抉擇——近二十年的研究與創新〉二文，收入氏著，《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12），頁 1-31。

5 值得注意的是 Lynn A. Struve 主編的 *The Ming-Qing Conflict, 1619-1683: 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 Guide*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8)與 *Voices from the Ming-Qing Cataclysm: China in Tigers' Jaw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二書蒐集了不少史料。尤其是後者專門翻譯明清之際見證朝代轉換時，曾經歷兵禍與逃難的人所寫的回憶，包括士人、商人、傳教士與宦官。近年來新編有兩本資料集出版，即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與周關東主編，陶繼明、葛秋棟選注（下略），上海市嘉定區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下略），《嘉定抗清史料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 關於此時期的離散、創傷與記憶的相關研究，主要是文學方面的作品，參見 Wilt L. Idema, Wai-yee Li, and Ellen Widmer, eds.,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一書，史學方面有 Lynn A. Struve, “Confucian PTSD: Reading Trauma in a Chinese Youngster’s Memoir of 1653,” *History & Memory*, 16:2 (Fall/Winter 2004), pp. 14-31，她的文本是清初人張茂滋的《餘生錄》。

7 最具代表性的是黃一農對乙酉江陰之變的研究，他指出許多文獻誇大了清軍圍城及陣亡的人數，更塑造出許多典範人物與傳奇事跡。參見黃一農，〈官方與民間、史實與傳說夾縫中的江陰之變（1645）〉，收入陳永發主編，《明清帝國及其近現代轉型》（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11），頁 131-202。

8 筆者僅見加拿大學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在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一書中，利用丁耀亢《出劫紀略》與李挺生《記難圖》二書，述及兩人分別在山東與河南的逃難過程。更專門的研究則是關於逃難婦女的形象研究，參見李惠儀，〈明末清初流離道路的難女形象〉，收入王瓊玲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台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頁 143-186。

士人，他們對抗清運動的看法也有不同於一般史書的評價。本文後半部乃透過這些親身經歷逃難痛楚的下層士人所書寫的文本，試圖從社會史、文化史與士人心態的角度來探析當時「逃難社會」下的特色。

一、第一階段：崇禎末年江南城市的逃難潮

晚明城居化的趨勢

過去史學界已發現明代中期以後，城市成了紳商富民移住的地點，尤其在江南地區特別明顯。這種鄉紳「城居化」的現象最常見的解釋，就是移居的鄉紳地主在城市以經營工商業更易致富，也就是城市的工商利益的誘因，促使他們移居城市。再者，在明末江南地區經營不動產，像是經營當舖、房屋出租等方面的獲利，也都要比投資在鄉村土地高出數倍之多。除了實際的經濟利益之外，從史料上又呈現出另一種看法，主張之所以移居城市是爲了便於社會交際，以獲得文化聲望。此外，城鎮裡多元的休閒消費空間，提供各式休閒活動與購物的空間，也是吸引鄉紳士大夫移居城鎮的一大誘惑。[9]

但是到了崇禎朝初期，遷居到城市的原因已不限於上述的理由，而是因爲政局不穩、地方不靖，爲了安全的理由而遷居。在明朝末年江南鄉村在治安上，的確不如城市，所以有些居住在鄉間的士紳爲了安全而遷居城內。例如《啓禎記聞錄》裡記載了一則故事，描述崇禎二年（1629）有鄉宦范長倩居天平山精舍，「擁眾貲、挾眾美，山林之樂，聲色之娛，吳中罕儷矣。三月間，長倩他出，忽有群兇乘夜劫之，約去金銀珠寶三萬餘金。語云：『慢藏誨盜，冶容誨淫』。長老亦有以自取哉。自是懼而移居郡城矣」。[10]可見當時鄉村不靖，尤

9 有關此議題，拙作《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一書的結論中，有深入的討論。

10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收入〔民國〕孫毓修編，《痛史》（台北：廣文書局，1968），冊 5，卷 1，頁 9b。該書有葉紹袁所撰之序文，但據柳亞子考證，該書所錄作者自身的經歷與葉紹袁《甲行日注》的內容，幾乎無一同者。故而論定該書作者確爲蘇州府人，然並非葉氏所撰，不知何人將葉氏自撰年譜序妄冠其首。參見謝國楨，《晚明史籍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125-126。此外，另有《吳城日記》一書三卷，傳抄本，原藏蘇州博物館。

其是有錢的富戶宅第，更容易成爲盜賊的目標。遷居到城內，對身家的財產安全有更多的保障。

不只是富戶鄉紳想遷居到城市，一般鄉村的百姓也以城市作爲臨時的避難地。因爲此時在鄉間常有許多謠言流傳，尤其每當某某盜匪或叛亂將屆的謠言四起時，鄉村的百姓也是急於奔入城內以求自保。如《乙酉筆記》描述崇禎十四年（1641）松江府轄內的鄉村謠傳的叛亂事件：

> 又於七月間，忽傳立教反矣。余時尚坐皋比，聞戶外號呼甚急。命徒視之，乃見男女攜包裹避難者填塞路左，皆望東南而奔。元兒方十三歲，余挈之歸，而青村城（即今奉賢城）已閉。武弁皆盔甲登陴，旌旗奪目，城外男女叫號者不可勝計。及余至時，管莊鎮撫陸韜士方啟之，而婦人行囊已半為奸民所掠矣。至晚始定，竟不知其何來？是時平湖一帶皆然，咸以為鬼兵動也。[11]

顯然鄉村的百姓聽到風吹草動，自然就想逃到城內避難；混亂之中百姓的行李反而多爲奸民所劫掠。

未雨綢繆的避鄉計畫

然而，到了崇禎末期，城居的士人中已有人意識到大亂將至，而計劃舉家遷居於鄉間者。太倉州的士人陸世儀（1611-1672）就是一例。陸世儀，字道威，太倉人，他所撰的《志學錄》一書，其實就是他的日記，內容詳細記錄了崇禎十四年一年內的日常生活。[12]當他在三月間聽到友人口述北方有人相食之

該書原有四冊，作者佚名，現有的三卷本係經清人葉廷琯刪節而成，並加有批注。該書與《啓禎記聞錄》卷 5 至卷 8 的內容基本相同，它們可能出自同一祖本，但《吳城日記》的文字脫漏與錯誤較少。參見〔清〕佚名，《吳城日記》，收入甘蘭經等點校，《丹午筆記．吳城日記．五石脂》（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 201-202 之說明。

11 〔清〕曾羽王，《乙酉筆記》，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 7。

12 關於陸世儀《志學錄》的研究，可以參考 Joanna Handlin Smith, *The Art of Doing Good: Cha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p. 123-154。關於陸世儀的思想，可參考王汎森，〈清初的下層經世思想〉，收入氏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 332-368。

事，深感將來必有外族入侵之禍，於是開始有避亂的想法。[13]四月時他與友人王鑑明、王發祥等人討論避亂應該遷居到何處？他主張要遷居到有水田之處的鄉間，雖然王鑑明認為水田有四大缺點：畏水、畏蝗、畏割據、畏賦役，但陸世儀一一駁斥，更言水田可居之理，在於「小亂則團眾以守，大亂則擇土而遷」。[14]至四月底，他聽聞揚州被圍，流寇有窺江南之意，南都甚危，更是焦慮。同時卻又被知州任命為州前鋪的約正，心裡更是不情願，而想找藉口辭退，於是更加強化他遷居城外的企圖。[15]此時他與諸友人再度多次討論遷居的問題，最後主張選擇西北水田之鄉間，因為該地具有六大優點：

> 因利乘便，不勞不費，一年可成。置水田，治亂俱適用，一也。豪傑樂助，二也。不去親戚墳墓，三也。任約正之責，無驚世駭俗之舉，而事易成，四也。辦積貯，聯鄉甲，施教化，俱奉上命，五也。圩岸易築水田，無虞，六也。……予極言西北水田之妙，宜速圖之。且當任約正一二年內，便可收拾家計，有乘勢之利，無駭俗之患。[16]

到了五月初，又聽聞流寇已迫近安慶，於是他更積極地邀約諸友討論遷居西北鄉間之事，諸友也都贊成。[17]

豈料到六月中旬，原來議定遷居的西北水田鄉村發生了災荒，進而有搶糧的暴動發生。於是又重新開始選擇避居的地點，他依然選擇的是城外十四都的鄉村，而不是留在城內。[18]八月時有海賊約數千人搶掠，就連福山兵船都有數艘被焚，駐守的哨官俱遭劫去。他認為：「亂形如此，有土者尚不思綢繆，未之如何底止也！」[19]該日記直到十一月都還記錄城內饑荒的景象，[20]但陸世儀

13 〔清〕陸世儀，《志學錄》，收入劉家平、蘇曉君主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北京：線裝書局，2003），冊 27，頁 340。
14 〔清〕陸世儀，《志學錄》，頁 348。
15 〔清〕陸世儀，《志學錄》，頁 350-351。
16 〔清〕陸世儀，《志學錄》，頁 350-351。
17 〔清〕陸世儀，《志學錄》，頁 352-353。
18 〔清〕陸世儀，《志學錄》，頁 358。
19 〔清〕陸世儀，《志學錄》，頁 367。
20 〔清〕陸世儀，《志學錄》，頁 381。

之後是否已遷居城外則不可知。[21]

到了崇禎季年，江南地區的城市住民雖然有城牆與駐軍可以防小股盜賊，但是更令他們擔心的卻是大型的軍事行動，往往以城市為目標。包括李自成的大順軍與明朝的叛將，往往以大城市作為攻伐的目標。就以蘇州為例，崇禎十六年（1643）正月，當時盤據在湖廣的大帥左良玉借口勤王，發兵由荊襄、經池州至蕪湖，所到之處無不騷擾。傳聞日甚一日，人心惶惶。到了二月二十九日，南直隸巡撫鄭瑄行牌蘇州府，指稱左兵有窺探四郡之意，下令預為防範。蘇州百姓得知消息後，首先是有力的大戶多運米下鄉，到蘇州城外的陽城湖及洞庭山、光福等處尋覓居住之地。如此輕舉妄動反而常在中途被盜賊劫掠。到三月初聲息漸緩，左兵終究未至。[22]

北京的陷落引起的不安騷動更大。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的大順軍攻入北京後，北京陷落的消息在南京官僚之間較早知悉，約在四月中旬。而江南其他地方則要到四月下旬至五月初才得知消息。[23]蘇州在四月二十五日得知此消息，其實早在一月前已有傳言，但大多數人都未敢遽信。後漸得知係真實消息，於是地方上出現許多騷動的情形。在城外西邊的楓橋，有眾多「無賴」盟聚，欲為不軌。而居民更是惶懼，皆恐身家不保。到四月底五月初時，許多城內居民，「挈貨帑，攜內眷，潛避洞庭山、陽城湖、光福及諸僻者，十有四、五，此由宦家巨室為之倡也」。鄉宦與巨室如此的行徑，在《啓禎記聞錄》中

21 根據陸世儀的傳記提到明清之際時，陸世儀曾參與抗清，「太湖兵起，嘗參其軍事。敗歸，鑿池寬可十畝，築一亭，擁書坐臥其中，不通賓客，榜曰桴亭。」相關的資料參見〔清〕徐鼒，《小腆紀傳》（台北：學生書局，1977），卷 53，〈列傳第四十六〉，頁 573-574；〔清〕錢林，《文獻徵存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咸豐八年（1858）有嘉樹軒刻本印行，1997〕，冊 540，卷 6，頁 237-239；〔清〕王昶等修纂，《（嘉慶）直隸太倉州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嘉慶七年（1802）刻本印行，1997〕，冊 697，卷 27，頁 453。

22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3，頁 3b。

23 傳到其他的地區則更久，如福建地區知道此事都已是五月下旬。參看岸本美緒，〈崇禎一七年の江南社會と北京情報〉，收入「明清時代の法と社会」編集委員會編，《和田博德教授古稀記念・明清時代の法と社會》（東京：汲古書院，1993），頁 347-364。該文又收入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 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頁 145-157。

作者有嚴厲的批評：

> 夫天下無事，諸軒冕貴人怙勢黷貨，坐享富貴，曾無裨於國計民艱。事變之來，又不能為禦災捍患之計，祇以身家慮重，但知營窟潛匿，以圖自全。不惜先去以為民望，臣實負國，朝果乏人。[24]

如此的批評也說明了一件事實，那就是鄉宦、巨室這類有錢、有勢者，他們是最敏感嗅到危亂而計劃逃避者；而且遷居避難的方向也出現變化，從崇禎初年爲治安避盜而遷居城市，到了崇禎末年爲避兵亂轉而計劃遷居到鄉間。直到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消息傳到江南各地，人心始安。

二、第二階段：弘光朝的滅亡與第二波逃難潮

南京的弘光朝並未帶來復明的契機，江南穩定的局勢也沒有持續多久。隔年，也就是順治二年乙酉（1645），清廷開始積極布署南下的兵力。二月，清廷命豫親王多鐸移師江南，趨往南京。三月，清軍取歸德，定河南。四月，清軍藉左良玉兵變內訌而進取亳州等地，原淮安守將劉澤清以入衛爲辭避而南下，淮安城守空虛而納款於清。清軍自是渡淮河攻揚州，四月二十五日砲擊城西北隅而破城，於是有揚州十日之屠。五月十日，清軍渡江，南京大震。

當清軍於五月十日渡江時，弘光帝聞警急走蕪湖。五月十一日南京街上鬨傳弘光皇帝已出城，京中文武官員一時隱遁。[25]部份沒有離開的官員將城門封禁的告示撕掉，讓百姓出城逃難。據《江南聞見錄》的描述當時的情景如下：

> 男女蜂擁出門，扶老攜幼者，不可勝數。間有娬〔按：嫵古字〕媚少艾，金蓮蹴蹋，跬步難行，見者心惻。既出而復，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閉門，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終矣。[26]

24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3，頁 7b。

25 南京降清的過程與城內百姓騷動的現像，當時留在城內的姚文熺（1623-1680），在其《明季日記》裏有更細緻與生動的描述。姚文熺，號在奄，字子畏，安慶府桐城縣人。參見〔清〕姚文熺，《明季日記》（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清鈔本），頁 28-31。

26 〔清〕佚名，《江南聞見錄》，收入〔清〕留雲居士輯，《明季稗史初編》（上海：上海書店

忻城伯趙之龍則出示安民，有「大駕播遷，本府死守此土，已致大清帥自有裁酌，爾民不必驚惶徙避」等語。十四日大清的告示遍掛通衢，見此民心稍定。十五日，趙之龍等明臣迎降，清軍進入南京城。十六日，忻城伯將搶掠大內的兵丁八人，綁縛遊於街市，又傳令百姓設香案，俱用黃紙書「大清國皇帝萬歲萬萬歲」、「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等字，又大書「順民」二字粘於門。[27]

雖然城市居民比較安心了，但是接下來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安置清朝的大軍。五月二十日有令命東北城區的百姓搬離，將居房讓與清軍居住，限三日內搬完。隔日開始，「合城百姓既苦搬移，又恐五鎮兵至，難免殺戮，惴惴弗寧。三日內之間，路不能行，而露宿道旁與暴棺城市者，不可勝記」。[28]南京東北至西南，路有二三十里遠，許多店舖的貨品都來不及搬離，只得棄置原地。[29]到了二十九日，中、南、西三城百姓倖免於遷居，將功勞歸於趙之龍，紛紛登門言謝。

蘇州的動亂與逃難潮

在短短不到一個月間，揚州與南京紛紛陷落，江南其他城市居民心中的恐懼更是無以言喻。就以江南大城市中的蘇州爲例，當四月底揚州陷落的消息傳到蘇州後，「吳中惶惶，有兵下之憂矣」。許多官宦人家聞風遁逃，清初佚名作者所撰之《蘇城記變》一書，同《啓禎記聞錄》作者的立場一致，批評那些只知逃走的官僚：

> 時守土諸臣，不思礪兵修雉，為天子保封疆，惟知臨難而迯〔按：逃俗字〕；林下諸公，不思散財募士，偕有司固吾圉，但知束裝而遁。[30]

據商務印書館 1936 年 12 月初版本影印，1988），頁 353。

27 〔清〕佚名，《江南聞見錄》，頁 355-356。

28 固密齋主人，《播遷日記》，收入〔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4，頁 11a；〔清〕佚名，《江南聞見錄》，頁 357-358。比對《播遷日記》與《江南聞見錄》二書後發現內容的記載大多相同，故兩書應爲同一書本。

29 參見〔清〕姚文禧，《明季日記》，頁 35-36。

30 〔清〕佚名，《蘇城記變》，收入于浩編，《明清史料叢書續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冊 18，頁 388。

五月五日端午到六日，競傳北兵必至，城市居民逃竄者紛紛。《蘇城記變》的作者陳述當時逃難的情景：

> 行至安利橋，但見城中男女老幼，爭門而出，哭聲震天，履舄徧地。孩赤委諸清流，老弱斃於踐踏。即一葑門如是，而他門可知矣。是日，鄰里親戚，各自逃生。余囊如洗，與老荊束手待斃。甚以舟泊河下，而嚴以却者。晨炊後，人心漸安，避匿者亦漸停止。[31]

這時原任巡撫張鳳翔、新任巡撫霍達、巡按周師盛等官員，早晨於南馬頭舟中會晤，但是一籌莫展。舊巡撫臺及巡按張、周二人俱於當晚逃走。新任巡撫霍達方至，不登岸，整日坐於臥舫齋，以便遁走。城六門徹夜不關，任避兵者入出，因爲擔心一旦禁閉，則人愈張惶，或可能釀成更大的變亂。[32]到五月十二日，逃至鄉下者愈來愈多，所以交通工具也是水漲船高。如轎一肩索銀一、二兩，少者亦索錢一、二千文。小舟一隻，索銀數兩，或索錢十餘千，得者以爲慶幸，不吝惜如此高價也。[33]十四日晚，大雨剛停，忽街中有一酒徒，大聲呼叫有逃兵在胥門外作亂，放火行劫，將及此地。「愚民不察眞僞，復震驚狂走，此語直沸至婁關，人多逃避，越宿無警，乃狼狽而歸，人心惶怯如此」。巡撫將搶奪的亂民四人斬於其所泊舟之處。[34]到十五日得知清軍已入南京，因錢謙益（1582-1664）在內之降臣力主招安江南，蘇州可保無虞，於是一時士民相慶。

其實，在這段期間蘇州人們的心理，就如同《啓禎記聞錄》裡的形容：

> 地方官長漫無主持，鄉紳但知潛避，無一倡義守禦者，小民無所倚恃，咸思投順，以苟全性命。[35]

蘇州百姓只想「苟全性命」的心態，在接下來的事件中反映最明顯。五月十九

---

31 〔清〕佚名，《蘇城記變》，頁 388-389。
32 〔清〕佚名，《蘇城記變》，頁 390；〔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5，頁 1b；〔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頁 205。
33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5，頁 1b；〔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頁 205。
34 〔清〕佚名，《蘇城記變》，頁 390-391。
35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5，頁 1b；〔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頁 205。

日，有生員楊維斗與舉人潘爾彪二人，[36]向知府推薦一位浙江人李涵春，二人聲稱李氏通曉天文與武略，可以推其爲領導，組織義兵。但百姓們則害怕重蹈揚州屠城的覆轍，居然群聚鼓譟，打毀潘爾彪家宅，毆死李涵春。知府及時出示要解散義軍，才止息眾怒。到二十五日，有原籍蘇州的降臣黃家鼐、通判周荃（字子靜）、參將吳某到府城內來招安，安撫蘇州市民，而原來明朝的官員卻已逃之夭夭。又據說錢謙益另有印記告示招安。[37]

看似一切都將和平落幕的接收計畫，卻因爲一件事而遭破壞，從此成了蘇州市民一場惡夢的開始。因爲二十九日來了一位明朝的監軍楊文驄，他將黃家鼐等四人擒住而殺之，唯有周荃逃走。到了六月三日，楊文驄得知消息清兵已至無錫，將要抵達蘇州。於是他搜刮府庫銀兩分給兵丁，自取萬餘兩，到次日黎明，登舟率兵遁去，至此蘇州人心瓦解。其實楊文驄在蘇州時根本未有認眞守城的舉動，只不過是「假公濟私之輩，意在垂涎庫藏」。[38]接下來的幾天，蘇州城內百姓知道楊文驄此舉勢將激怒清軍，必有玉石不分之禍，於是紛紛置舟避鄉。《蘇城記變》一書就詳細記載作者在這段時間的逃難過程。雖然作者佚名，但從內容上看來，應該是位下層的讀書人，但年紀稍長，因其自云：「已續弦於葑門外之曹氏」，又云：「余囊如洗，與老荊束手待斃」，顯然作者並不富有，甚至算不上中產之家。[39]以下是之後幾天作者的逃難經歷。

六月四日，蘇州城內已是十室九空，之前作者鄰居猶有四婦，如今已空無一人，只剩作者夫婦閉門俟命。到了中午，作者聽到馬蹄聲自北而南，再從門隙中窺見北兵狀貌猙獰、衣裝怪異，有數隊騎兵爲追楊文驄等人而經過其家門。當數隊經過後，有一隊行至他家門前卻忽然停止，作者手足無措。他聽說清兵最痛惡門扇黏貼武士圖像，所以民間皆已磨洗殆盡，只有他家與另一鄰家

36 〔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頁 205 之眉批云潘爾彪：「字京慧，崇禎丙子舉人，後從吳日生起兵，憤懣而卒」。

37 〔清〕佚名，《蘇城記變》，頁 391-392；〔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5，頁 2a；〔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頁 205-206。

38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5，頁 2b；〔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頁 206。

39 〔清〕佚名，《蘇城記變》，頁 388-389。

猶貼有武士圖，他以爲可能因此觸怒清兵，一家命將有不測。不一會兒，清兵卻又揚鞭而去。作者雖免於禍，然已「驚魂奪魄」！到了黃昏之時人心甫定，作者見遠處有火災，未幾焰息，乃清兵追文驄未獲，於是舉火焚其所留下來的舟船。

作者當夜難以入睡，到了隔日清晨夫婦二人立即逃至後村的一間尼菴避難。入菴內見到已有婦女多人，喘息稍定。接著就聽到許多傳言，說是清兵三五成群，分道掠奪某巨室，或是某家姑媳悉被淫污，某家少婦投水自殺。忽然有村人來報清兵近在咫尺，不久即見三人到了門口，但見菴內的韋馱像，相顧不敢入，作者等人又逃過一劫。午後，聽到更殘酷的傳聞，說是凡婦女遇清兵者，無論衢港、田野，即被裸狎之，且多有頃刻致斃者。即使清之鎭撫、知府示禁，亂兵仍是置若罔聞。作者和一友人到城廟，親見清兵狎挾北柵陳醫師家之少婦，接著又看到殘忍的一景：

> 回經一曲徑，見二女屍，紗衣碎〔按：碎〕裂，渾身血污。詢乃一母一女，被獲淫死者。目睹心傷，其他得於傳聞者，難以枚舉，真斯民一大厄刦也。[40]

當日清之主帥駐兵在社壇，傳聞其有屠城之意，賴逃走的降臣周荃力勸而止。夜來作者獨自回到城內原來的住處，「聞蟲鼠音聲，亦夢中驚惕，若人排闥直入，刃將加頸者」。[41]

六月初六日，清軍遍拘船隻，下鄉剽掠。八日，大股清兵趨往武林，留蘇者淫掠如故。百姓具呈於巡撫土國寶等官，得到的回答卻是：「城以外，非吾事也」。[42]十日，作者從尼菴乘船返家偵伺，途中遇到三人阻止他，說清兵有拘人行舟，勸他毋往。轉盼間，清兵已至眼前，那三人驚走，作者心想自己行動不敏捷，勢必被拘執。但清兵只對他搖搖手，就前趨捉拿另一人而去，不知何故也。直到六月十二日，蘇州的情況稍微寧靜，作者向城內外探望親故，「有

---

40 〔清〕佚名，《蘇城記變》，頁 397-398。
41 〔清〕佚名，《蘇城記變》，頁 398。
42 〔清〕佚名，《蘇城記變》，頁 399。

掩扇無覓者、有安居無恙者」。後來作者又與族兄一同至社壇觀看貝勒大營及駱駝等異物。十五日，原來在一起逃難的諸女伴皆已各覓舟散去，作者也在傍晚同妻子返回城內老家。但作者總覺得城內不安寧，終究非久住之地，乃於二十日覓得一船攜家避往鄉村，俟平靜以圖歸計。[43]

城鄉地位的翻轉

至於其他江南的城市居民呢？例如崑山在乙酉年春天就有童謠云：「富家莫起屋，貧人多食肉，新秋初五六，白日聞鬼哭」。入夏，警報日至，士民有自城內播遷至鄉村者，也有畏懼鄉村多盜而遷入城內者。[44]但遷入城內的情形是少數，大部份的情況仍是由城逃往鄉村。例如離南京較近的溧陽縣，據當時的布衣馬世傑（1608-?）[45]的回憶如下：

> 五月十有二日，聞金陵失守，車駕播遷，溧陽人情騷動。未幾逃吏逃兵，絡繹于城外，皆隱其故不言，人情益駭。余恐城中有倉卒之變，十四日攜老妻幼女去南山，相隨者一婢一僮耳。[46]

又如吳江縣城的居民在得知清師渡江後，紛紛逃避到鄉村，據《庉村志》的描述如下：

> 郡邑女士避難吾地者，舟前後相接。僦居徧市滿村，闐如城邑。至六月初三日，忽訛傳大兵且至，男女奔逃者，至相枕籍。塵埃煙起，喧

43 〔清〕佚名，《蘇城記變》，頁 400-401。

44 〔清〕梅村野史，《鹿樵紀聞》，收入〔民國〕孫毓修編，《痛史》，冊 3，卷上，〈南國愚忠〉，頁 23a。因爲作者署名「梅村」，所以常被誤以爲是號「梅村」的吳偉業所撰，或以爲是吳偉業著《綏寇紀略》之別稱。然而此書內容與《綏寇紀略》完全不同，所敘鄭氏之亡一事，當時梅村已早卒，故梅村野史當是另一人，絕非吳偉業所撰。

45 馬世傑，生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卒年不詳。字萬長，號欲齋，江蘇應天府溧陽縣人。順治八年（1651）歲貢，以耳疾淡於祿仕。閉門著書，授徒爲業。暇則遨遊山水林，賦詩取樂。與弟馬世俊以文學聞名江南，時稱「二馬」。其傳記可參看〔清〕吳學濂纂修，《（乾隆）溧陽縣志》，收入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據清乾隆八年（1743）刻本影印，2011〕，卷 7，〈人物〉，頁 27-28。

46 〔清〕馬世傑，《孑遺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抄本影印，2010），冊 26，卷 3，〈雜文・記乙酉六月二十六日遇難始末〉，頁 386。

呼雷發，頃之乃定。此承平日久，驟聞此異，倍為驚駭者也。[47]

最值得注意的是松江府上海縣的情形，住在縣城的居民向來現實又自豪，對鄉村的人有歧視。但是當揚州兵敗之消息一到，縣城居民老幼悽惶，分頭奔竄之際，人們的觀念也出現極大的變化。姚廷遴（1628-1697）的《歷年記》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論述：

> 上海人性惡薄，凡村中與城中親友往來，必受虧幾分，目其為鄉人也。惟是此時依親及親，卑辭厚禮，覓得一間半頁，即挈家而棲，以為萬幸。[48]

過去縣城居民總覺身分高於鄉村親友，如今為了「大亂避鄉」，反而城居市民需要到鄉村依親，所以得低聲下氣，如此城鄉的地位出現了翻轉。據府志記載以前「鄉士大夫多有居城外者」，晚明以來，松江府內士紳漸有遷居到城市的情況，遂有所謂：「今縉紳必城居」之語。[49]而且城居者明顯帶有一種傲態，瞧不起鄉村的人。如今這種傲態因為戰亂的衝擊而徹底崩解。

三、第三階段：薙髮令後的抗清活動與第三波逃難潮

雖然清豫王多鐸在招安江南時，蘇州發生楊文驄殺害清使臣黃家鼒一事，以致激怒多鐸，派八萬兵下蘇、杭；但整體而言，江南城市並未有太多抵抗。尤其當清兵進趨杭州時，「明潞王常淓度不能守，率在城各官迎降，請毋殺百姓。貝勒許之，按兵不入，市不易肆，東南郡邑一時帖然，猶若不知有鼎革之事者」。[50]直到六月十五日薙髮令下，令全國十日內盡行剃髮，而人心始動搖，抗清之舉紛紛四起。江南各地起事者，多是由前明之官員與士紳發起，包括如

47 〔清〕曹煒，《庉村志》，收入趙詒琛、王大隆輯，《甲戌叢編》（台北：世界書局，1976），〈異紀〉，頁 16。

48 〔清〕姚廷遴，《歷年記》，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 56。

49 〔明〕方岳貢修，〔明〕陳繼儒等纂，《（崇禎）松江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崇禎三年（1630）刻本影印，1991〕，卷 7，頁 28a-28b。

50 〔清〕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卷上，〈南國愚忠〉，頁 22b。

嘉興之徐石麒、嘉善之錢士升與屠象美、松江之沈猶龍、江陰之諸生許用與典史陳明遇、金山衛有指揮使侯承祖。蘇州府轄下的抗清活動，有嘉定縣之侯峒曾與黃淳耀、常熟之總兵何沂、崑山之朱集璜與朱天麟等人所領導起事；[51]太湖一帶則陸續有副總兵魯之嶼、進士吳易等人，以及陳墓鎮的諸生陸世鑰所領導的抗清軍隊，又有湖盜赤腳張三附合之。[52]

抗清的守城與攻城

在這波抗清的運動中，最常見的情況是以城市爲中心，號召城鄉居民組織義軍來守城，並與明朝殘餘部隊相配合來抵抗清軍。例如江陰、嘉定、常熟、崑山、松江與松江府所屬的金山衛等城市，其中又以江陰與嘉定二城抗清之事最爲人熟知。當時有「苦莫苦於嘉定，慘莫慘於江陰」之謠，蓋指江陰、嘉定是被清軍屠戮最甚的兩城。[53]

在江南抗清的城市中，以江陰縣城相持最久。最初是在薙髮令下達的次月，也就是閏六月初，有諸生許用於明倫堂中聲明:「頭可斷，髮絕不可薙也！」於是合邑聞風響應，四鄉居民分別成立義兵組織，由典史陳明遇主其事。據云陳明遇出巡城時，凡鄉兵搏戰至城下者，必開門獎納，鼓以忠義。每獻一級，城上賞銀四兩，明遇爲之下拜。以故各鎭鄉兵，俱同至城下打仗。清兵所至，各鄉盡力攻殺，幾乎不得安處。[54]之後清大軍殺到，城中危急，又請出原任典史的閻應元組織守城事宜。一直到八月二十一日城被攻破，兩方仍在城內巷戰，直到次日。該城共守了八十一天，據估計死傷的人數如下：「清兵至城下者二十四萬，攻城死者六萬七千有奇。鄉戰死者七千有奇，通計清兵死事，不下七萬五千有奇。而吾邑之殉節被難者，且十萬矣」。[55]

---

51 〔清〕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卷上，〈南國愚忠〉，頁 23a。

52 〔清〕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收入孫毓修等輯，《涵芬樓秘笈》（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第二集，卷中，〈平定姑蘇本末〉，頁 35b。

53 〔清〕蘇瀜，《惕齋見聞錄》，收入俞子林等編纂，《叢書集成續編．史部》（上海：上海書店據丁丑叢編本影印，1994），冊 26，頁 3a。

54 〔清〕趙曦明，《江上孤忠錄》，收入〔民國〕孫毓修編，《痛史》，冊 8，頁 3a-3b。

55 〔清〕趙曦明，《江上孤忠錄》，頁 11a。雖然有些文獻稱清軍屠城時有自我設限，但從更多

嘉定抗清的模式與江陰相似，也是當六月薙髮令下達到縣，遠近大譁，開始有揭竿而起者。在城內有人組織鄉兵，其後在鄉村也一呼響應，動以數萬人計，各自守該地域，有號稱王家莊兵、石岡兵或南翔兵等。[56]清派來的降將李成棟先是遭鄉兵追擊而逃出，之後擁重兵前來討伐，鄉村之義兵紛紛遭擊敗。而城中開始有侯峒曾等人入城與士民分部巡守，並立挨門出丁法，根據資產將戶等分上、中、下三等，負責出丁備糧，或出銀若干以備客兵糧餉，將城四隅分屬各圖來巡守。[57]嘉定城本來是土城，嘉隆年間倭寇之亂時，群寇屢攻不能下。自從知縣楊旦築磚城後，嘉定城更成爲江南最完固之城池。清兵發大砲仍難攻破，最終是在東關北偏處攻破，李成棟下令屠城。[58]之後清軍旋退出嘉定。接著因爲朱瑛重興義旅抗清，浦嶠等人勸清將領李成棟入城屠殺，以剿絕反清的殘存勢力，於是七月二十六日城破再遭屠。至八月十六日，原明把總吳之蕃反清失敗，復遭屠殺。清末民初的學者遂稱之爲「嘉定三屠」。[59]

崑山是將清派來的官員殺死，再由邑紳朱天麟、徐開禧等各募鄉兵，或屯

當時人的回憶顯示城內死事之慘烈。參見黃一農，〈官方與民間、史實與傳說夾縫中的江陰之變（1645）〉，收入陳永發主編，《明清帝國及其近現代轉型》，頁 43-53。

56 〔清〕朱子素，《嘉定縣乙酉紀事》，收入〔民國〕孫毓修編，《痛史》，冊 8，頁 3a。署名朱子素所述之嘉定記事，共有三本不同名稱之筆記。較早出者爲《東塘日劄》與《嘉定屠城紀略》二書，其內容大同小異，應該是一相同之書，後者爲忌諱而更書名。另有《嘉定縣乙酉紀事》，與前二書的內容差異較大，可能是由《東塘日劄》輾轉傳抄而出者。參見謝國楨，《晚明史籍考》，頁 660-663。關於朱子素其人，字九初，號湛庵，爲嘉定竹刻創始人朱鶴的曾孫，竹刻大家朱纓之孫，明崇禎十三年（1642）諸生。朱子素世居嘉定東城清鏡塘（又稱東塘），與侯岐曾爲密友。在《侯岐曾日記》中，朱子素是出現得最爲頻繁的友人。江南的抗清戰爭爆發時，朱子素所居的東城爲義兵和清軍激戰之地，又是清軍屠城最爲殘酷的地方，朱子素親眼目睹清軍的暴行。此外，他還著有《歷代遺民錄》、《吳𠻳文獻》、《哀貞記略》等。清代順治年間，他不應貢生考試，在家鄉授徒著述，以遺民自居，終老於嘉定。參考周關東主編，《嘉定抗清史料集》，頁 7。

57 〔清〕朱子素，《嘉定縣乙酉紀事》，頁 5b-6a。

58 〔清〕朱子素，《嘉定縣乙酉紀事》，頁 9b；〔清〕朱子素，《東塘日劄》，收入周光培編，《清代筆記小說》（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冊 12，卷 2，頁 2b，總頁 506。

59 據朱子素《嘉定屠城紀略》一書的記載，當時清軍在嘉定境內大規模地屠殺前後共有六次，發生在五個地點。其中兩次在城內，四次在城外的市鎮，三次有屠殺的人數紀錄。正文的這三次是通常較被史家提及的三次，然而第三次是發生在城外的吳項橋。而最早稱之爲「嘉定三屠」是見於鄒容（1885-1905）的《革命軍》。以上的考證參見陸慕祥〈嘉定三屠小考〉與徐保平〈“嘉定三屠”新探〉二文，皆收入於周關東主編，《嘉定抗清史料集》，頁 145-148；154-157。

城外之眞義或雙鳳，知縣楊某亦募鄉兵數百人，入城共守。[60]常熟在薙髮令下達後，邑人殺清之主簿陳某，倡議義兵，邑人推兵部職方司嚴栻主持兵事。[61]清軍雖曾一度攻破，但班師還府城後，當地義兵又再據之，並阻清官入縣城，直到清軍平定常熟近鄰福山塘的鄉兵，常熟一縣才算平定。[62]

江南其他的地方，組織鄉兵抗清者大多分布在鄉村，在城內並未有組織鄉兵守城，如吳江縣城內僅是在下令剃髮後，有鄉兵入城將縣令孔允祖殺害，卻無能力守城。當大批清軍前往攻城時，這些鄉兵劫掠縣庫與劫獄後即遁走出城，城中市民聞訊也早已遷移過半，所以清兵攻城時並無對壘情況。清帥僅責城中人不救護父母官，於是大肆搜索，被屠殺者僅數十人，因兵丁各取財爲急，皆厚獲而歸，市民也趁此機多有逃匿者。[63]

太倉與蘇州則是另外一種典型，因爲原地清之駐軍較多，城內居民雖心有不滿，仍得接受剃髮，而城外則是鄉兵聚眾圍攻城市。[64]例如在太倉州當閏六月十三日午後各閉城門，軍民一概淨髮，是日，「城內民亦洶洶思變，各立街巷間，相視以目。有急爲避出者、有遲疑不動者，無一人敢發難端，俛首受薙」；而鄉村的鄉兵則聽到不同的傳言，如沙溪鎮裡謠傳城內百姓因薙頭而持梃相擊，清兵幾乎被殺盡。於是鎮內由奴僕所組織成的烏龍會有倡鄉兵合剿之說，集結二千多人準備攻城。到了城外淮雲寺駐紮做飯，不防敵人已近，忽砲聲一響，清兵三人開門殺出，大北門又一騎殺出，兩相要截，鄉兵無不喪魄狂走，互相蹂躪。其奔脫者抱頭而去，其殿後及食餅者無不被殺。鎮民描述鄉兵逃回的狼狽狀：「方早膳時，敗兵踉蹌北歸，掩蔽而下。至亭午，到者皆身被數創。至晚不歸者皆覆沒，共百十餘人」。[65]

---

60 〔清〕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卷上，〈南國愚忠〉，頁 23b。

61 〔清〕漫遊野史，《海角遺編》，收入于浩編，《明清史料叢書續編》，冊 16，《虞陽說苑》甲編，頁 526。

62 〔清〕漫遊野史，《海角遺編》，頁 553-555。

63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5，頁 8a-9a；〔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頁 213。

64 〔清〕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卷上，〈嘉定之屠〉，頁 26b-27a。

65 〔清〕婁東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收入〔民國〕孫毓修編，《痛史》，冊 10，頁 6b-7a。有關烏龍會的始末，參見森正夫，〈一六四五年太倉州沙溪鎮における烏龍會の反亂について〉，

蘇州的情況更是弔詭，當閏六月十三日早，忽聞砲聲，六門外起火，城門頓開，有民兵先從葑門入，隨後各門陸續有鄉兵進入。鄉兵以白布裹頭，手持大明旗號攻入城內，又放火燒府縣署與都察院等官署。當時清朝巡撫土國寶與總督李延齡[66]等人都聚集在府庠瑞光寺前，屯兵自衛。是夕，民兵劫囚以去後，街坊仍有敲梆放砲，吶喊之聲相聞。但是部份居民知道此舉一定會觸怒清朝官員，恐不免受遷連而遭誅屠，於是有人倉猝挈家遠遁。據《啓禎記聞錄》云：「向來李公有令，不許鄉紳士庶攜妻子貲貨出城，違者論斬。此際六門洞開，無復禁令，出者踵相接矣」。[67]隔日，城中居民來不及逃命出城，或無法遷移者，由降臣周荃授意，群往總兵署懇求，呈言倡亂者非城市小民，請求原諒。到了晚上，李延齡與土國寶各出示安民，指稱：「察知此舉，係楊監軍餘孽勾連海寇爲祟，大兵到日追剿，城中良民不必驚恐。但須協力守城，緝拏奸細耳」。[68]果然百姓也很配合，夜間民夫上城防守。到十八日，南京派來的援軍數千人已到，城外鄉兵見狀不敢攖其鋒，於是縱火南北濠，掠取財貨衣物婦女而去，當時被殺者多屬戀家未離去的百姓，或各行商賈之顧惜貨物者。[69]當李延齡到城上巡視時，守城人民跪下懇求寬宥，他則安撫民眾說道：「天熱不必跪，起來起來！前日你們放火欲燒死我，我又燒不死，如今卻來幫我，這不是幫我，欲保全妻兒老小耳。我已分付（按：吩咐）過不殺城內之百姓了，可放心也」。[70]

收入明清史論叢刊行會編，《中山八郎教授頌壽記念 ·明清史論叢》（東京：燎原書局，1977），頁 195-232。

66 據《新校本清史稿》，卷 273〈列傳六十〉之記載：李延齡即李率泰，字壽疇，漢軍正藍旗人，李永芳之子，初名延齡。順治二年，從豫親王多鐸破自成兵潼關。移師南征，克揚州，下江寧，分兵定蘇州、松江諸郡。江陰典史閻應元拒守，督兵攻破之。豫親王令駐防蘇州。會明將吳志葵、黃蜚等來犯，時城兵僅千餘，率泰使遶城張幟爲援兵狀。志葵等斬關入，勁騎突起截擊，盡殲之。

67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5，頁 5b-6a。〔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頁 210。

68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5，頁 6a。〔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頁 210。

69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5，頁 6b。〔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頁 211。

70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5，頁 7a。〔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頁 211-212。

這兩座城市因爲城內居民已先剃髮，蘇州城內居民甚至還助新官守城；而郊外鄉村仍然組織鄉兵與清軍對抗，進而形成城鄉的對壘之勢，甚至釀成無辜者被殺的慘劇。《研堂見聞雜記》指出太倉州的情形：

> 吾城自削髮後，惟鄉民梗頑自如。有髮者不得城行，削髮者不得下鄉，見者共殺之，鄉城閉塞。[71]

《啓禎記聞錄》記蘇州的情形：

> 總之城中士庶，自前月十一、二日剃髮以來，上官止欲留頂大配口，修之又修，如式者多矣。乃郊外之民，多未刈髮，內外相持，實抱隱憂。其有冒昧入城，致罹鋒刃者，未可枚舉。[72]

如此抗清的活動反而演變成城鄉的對立，造成城鄉居民之間的仇殺。這說明剃髮作爲政治認同的符號，原本對菁英階層而言它的意義遠遠大過一般百姓。然而一旦這樣的符號象徵被深化，被賦予身分區分的意義，那麼即使是被逼迫與不情願，仍舊會造成仇恨的根源。

由城逃鄉：以常熟為中心

到了薙髮令下達後，江南各地紛起抗清運動，以城市爲中心的守城抗清行動中，迫使城市居民逃遷城外，形成第三波逃難潮。在這波逃難朝相較前兩階段，留下較豐富的個人逃難紀錄，如關於常熟有劉本沛《虞書》與作者佚名的《海虞被兵記》，涉及嘉定的有朱子素的《東塘日劄》等，其他還有關於上海縣的曾羽王《乙酉筆記》與姚廷遴《歷年記》。其中尤以《海虞被兵記》一書內容最爲詳盡，以下即以此書的敘述爲中心，再配合其他的記載，來探討當時城市住民逃難行動的一些共同特徵。

常熟縣在抗清的過程中，有一位住在城中的下層士人留下了一本親身經歷的紀錄，書名爲《海虞被兵記》。這位佚名的作者自稱在五月中曾預言城內必亂，於是遍告親友。又提到閏六月十二日他的兒子入城準備中元祭祖，但夜裡

---

71 〔清〕婁東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頁 8a。

72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5，頁 9a。〔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頁 214。

作了一場夢，夢中有人告訴他莫要進城，城中將發生大屠殺。作者聽聞其子所作的夢後，心裡一驚，有警覺應儘早離城。[73]十三日晚聽聞城東市的佛像頂上有異相，當晚即發生鄉兵殺清之主簿一事，作者認爲佛像上有妖相是不祥之兆，常熟恐有遭屠城之禍。於是急忙叫媳婦帶領兩個孫子逃到鄉村，雖因此家中糧食財物可能會被鄰人席捲，但作者告誡說兩軍將戰，城中必亂，如此資產並不足爲惜。[74]

六月十四日早晨老僕急來告知城已破，其子倉皇催促作者逃命，作者正在躊躇間，其子已帶孫兒不知逃向何處。作者遂帶著老伴和弟弟，以及七十多歲的老嫂到北門。因爲北門未開，所以他先將家眷安置在城門側，自己一人冒雨回到家中擬稍加收拾。途中險些被南門外所發之砲擊中。收拾完畢後正欲鎖門，突遇頭戴著騣帽，身背長布袋的男女數人，告訴他說北門已被敵兵盤據，作者無奈，只好與其兄閉戶摒息以待。忽聽到騎兵聲由北來到他家門口，接著聽到鐵甲操戈者一擁入室，但不久即離去，如此多次，終究未發現作者。[75]作者事後回憶到：

> 予居市心，仍祖父之舊，門頗敝，門內即蓬蒿矣。兵之疊來，而竟去也，蓬蒿之力哉。然吾親友家更有敝於吾者，而俱弗免也。聞兵戮貧士，輒罵曰：「爾等富人，借此破屋以自藏耳！」噫，儼幸哉。[76]

隔日早，作者向後屋一照，發現原來那些戴騣帽背長袋的人中有三人不見，原來是前一天晚上他們想逃到西門外，途中被敵兵發現而其中兩人被殺。當天中午騎兵聲又來，作者仍是倒臥以待，終究仍是杳然。晚上鄰牆有壯夫從隔樓攀樹而下，作者之兄大駭以爲是清兵，原來是守南城的鄉兵，城破後伏在城濠下，夜半逃走時遇敵兵才躲入鄰家。隔日天亮，聽到騎兵聲向南去而漸遠，兩鄉兵高興地說敵兵已離去，相慶得生。但是作者當夜卻輾轉難眠，因心中掛

73 〔清〕佚名，《海虞被兵記》，收入于浩編，《明清史料叢書續編》，冊 16，《虞陽說苑》甲編，頁 1a。
74 〔清〕佚名，《海虞被兵記》，頁 7a-7b。
75 〔清〕佚名，《海虞被兵記》，頁 1b-2a。
76 〔清〕佚名，《海虞被兵記》，頁 7b。

念親人安危，夢中擲骰子占卜，併立如筋，自己解釋應該是個吉卦。[77]

十六日作者聽到門外傳來常熟方言聲，才敢打開門戶，原來是福山鎮的明軍。至晚，奴僕自鄉來，始得知家人皆倖存。[78]十六日上午，出門到街上看到遭屠之慘狀，無一家得全，無一門不破。又聽聞孝子尋親而被殺之事，即友人之弟周二官，於十四日早已出城，忽與父親相失，於是其弟冒險再入城覓父，誰知父已到鄉，而弟竟捐軀也。[79]

十七日早，忽傳清兵又南來，滿城鼎沸。作者又欲由北門逃出，被其姪阻止而轉由南門出。其姪走南鄉，盈田塍間，皆小兒屍，或坐，或俛，或仰，肌肉爲蚊蚋咂盡，只剩白骨而已。作者走東鄉，有自北關來者說：「城門擠甚，踏死者凡七人，此又中元，餘殃也」。作者慶幸自己獲免。[80]作者有一段結語：

> 七月十四，巳刻，大兵破城。城中先避者過半，不及避者，貧富老幼俱死，或潛或出，或迎拜，俱死。遇害不下萬人，一時淫殺甚慘。又擄去男婦暨童男女，約三千餘人。[81]

上述的經歷反映了當時城市居民逃難的許多面向。首先，既然抗清的鄉兵有許多是官紳招募或組織城坊居民而組成的，當然城市居民早已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這些守城抗清的城市裡，一般老弱婦孺多已預先安排逃難的行動，就像上述《海虞被兵記》的作者所云：「城中先避者過半」。又如嘉定城內的居民在清軍攻城前的七月初三日，「嬰兒婦女狼奔鼠竄，雖至窮苦，必以一簪一珥繫肘，問曰，此買命錢也」。[82]顯示早已有相當多的城市居民逃離嘉定城。江陰的例子較特殊，當閏六月一日城內士紳倡義守城後，初三日時城中戒嚴，士民議曰：「我等誓死守城，其老弱婦孺與不能同志者，宜速去！」十一日，因清兵三日不至，城中逃難者咸以敵去，遂絡繹而來。數日間，民人復

---

77 〔清〕佚名，《海虞被兵記》，頁 2a-2b。
78 〔清〕佚名，《海虞被兵記》，頁 2b。
79 〔清〕佚名，《海虞被兵記》，頁 5b-6a。
80 〔清〕佚名，《海虞被兵記》，頁 6a-6b。
81 〔清〕佚名，《海虞被兵記》，頁 2b-3a。
82 〔清〕朱子素，《東塘日劄》，卷 2，頁 2a，總頁 505。

聚。[83]雖然有部份的老弱早先遁走，但是後來有部份居民又回城，再加上鄉兵集結於城內，所以到八月二十一日城破時，「丁壯在城者，戰死已十之六七，空壁而已」。[84]

其次，當城市居民未及時逃出城而清軍已經開始攻城時，這些居民思考逃難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選擇從那一個清軍尚未攻下的城門逃離。然而，當時城內抗清的領袖可能會認爲開城門是作獻城之舉，於是孤注一擲而封閉城門，最終造成更多平民百姓的喪命。嘉定就是一例，據朱子素的《東塘日箚》的記載如下：

> 七月，……方城破時，西門尚未弛懈，城中男婦悉西走。街路俱為亂石阻塞，顛頓得達，號哭求啟西關，淳耀堅握鎖鑰不應。其同榜進士王泰際適至，為百姓請命。淳耀大怒曰：「若欲獻城，君請自為之，我頃刻死人，不顧年誼矣。」泰際泣，急走南門，縋城遁。及成棟兵到，方聽啟閉。城門為巨石堵塞，僅容一人往來，然鼠竄而出者尚數千人。……難民在下者，反為屋木亂石所塞，不得路，悉投河而死，水為之不流。[85]

崑山縣也是相似的例子，據《鹿樵紀聞》載，當清兵來剿崑山縣城時，有當地居民王志古以同知從軍，因爲其父母在城，遂請求攻城的各營網開一面，於是清軍只屯駐城西，多發空砲，希望嚇走守城者，「奈起事者倡死守之說，堅閉六門，不開出入，以致闔城同殉」。[86]

當清軍攻陷城池開始屠殺之際，是逃難者最艱辛與最悽慘的回憶。在江陰城陷之際，「清兵屠城凡三日，晨出殺人，暮則歸營。八月廿二、三日，晝時避難，夜間可逃」。[87]《澄江守城紀事》的作者季承禹（1626-?），字文若，

83 〔清〕韓菼，《江陰城守記》，收入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10、12、14。
84 〔清〕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卷上，〈南國愚忠〉，頁 25b。
85 〔清〕朱子素，《東塘日箚》，卷 2，頁 2a-2b，總頁 505-506。
86 〔清〕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卷上，〈南國愚忠〉，頁 24a。
87 〔清〕計六奇，任道斌、魏得良點校，《明季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 4，〈江陰續紀（難民口述）〉，頁 249。

江陰人。當清兵於順治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攻破江陰城，季承禹混於難民中潛出城外。他在《澄江守城紀事》記八月二十二日，即城陷隔日的情景：

> 城中婦女老幼，無欲生者，或投於河或投於井，死者無算。凡泮池、孫郎池、湧塔庵池、玉帶河、內城河、外城河、校場河、四眼井及人家井中皆積屍數層。自焚死者，煙火三日不絕。又有士民數十避在文廟天花板中。大軍破城後，有兵數千夜住文廟內。數十人乘其不測，下與相殺，傷數百人，遂各自刃死。[88]

毫無疑問，要想安全的逃離，千萬不能曝露在敵兵的視線下，所以《海虞被兵記》的作者藏臥在家裡，躲避了經過的騎兵。朱子素逃離嘉定城，也是「匿叢篠中得免」；而且他還親見殺人情狀：「初砍一刀，大呼都督爺饒命。第二刀，其聲漸微。以後雖亂砍，寂然無聞。刀聲劃然，達於遠近。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所殺不可勝計。其懸梁者、赴井者、斷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彌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萬人」。[89]

避鄉之不易

所謂「大亂避鄉」，但逃到鄉村就眞的可以安全了嗎？其實也不盡然。首先我們看到鄉村一些打著抗清旗幟的鄉兵或民兵組織，其本質大多是烏合之眾，並無紀律。而且又常藉勢勒索搶奪或報復仇人，當面臨眞正的清軍時卻又無太大的作用。葉紹袁（1589-1648）在《甲行日注》裡就提到：「時義兵飆起，皆閭左隴上耕傭，聚千人至我族索餉，不得則一炬焚之。……時隊伍未整，虜下索則又鳥鼠散，而平民罹之」。[90]就像曾羽王在《乙酉筆記》中一針見血的指出：「然皆非紀律之兵，威令又不及遠，以至地方到處殺人，或以冤家報復，或以搶掠劫焚」。接著他記載當時松江府上海縣轄內的實際狀況：

> 浦西人至浦東，則以為尷尬〔按：指行為不正常、鬼鬼祟祟的人〕。

88 〔清〕季承禹，《澄江守城紀事》，收入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90。
89 〔清〕朱子素，《東塘日劄》，卷 2，頁 3a，總頁 507。
90 〔清〕葉紹袁編，《午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939。

行頭人至新場，則以為細作。白日殺之，略無顧忌。在何家橋之搶掠者，地方不平，合力攻之，一時而殺九命。至如行頭之殺嚴氏六七人，新場之殺朱氏七人，徐氏之殺聞孟嘉，聞氏之復殺徐九飛，青村高橋之殺陶待詔，丁官、林七之殺鎮撫陸劍南，自六月至八月，行路者無不帶刀，遠出者必遭奇慘。[91]

松江府的亂象到八月初三，清兵破府城後，其風稍定，但鄉鎮猶有殺掠之事。一直要到九月初各地方都有新官上任，才算完全平定。

在江南的鄉村分布著許多小市鎮，這些小市鎮是城外居民較多聚集的聚落，地方鄉兵的組成也多是奠基於此。以上海縣內的周浦鎮爲例，姚廷遴《歷年記》裡描述該鎮組織鄉兵的過程：

周浦地方雖小，打降極多。大富者雖少，而小康者亦多。故強梁者立起議論，倡為先鋒之說。分一鎮為四境，每鎮之富商店鋪，或兩數或錢數，各就其地，每日送與強梁為防護焉。整備刀槍器械，置造旗幟衣甲，編十家為甲，練集鄉兵，鑄成大炮，以禦搶掠。此時余正在鎮，日見其揚兵耀武。[92]

然而這個鎮的鄉兵與附近蘇家橋一帶的鄉兵之間，發生了磨擦，甚至釀成兵戎相見。蓋因蘇家橋有陸寅、王六者，專門截搶客米，被周鎮的鄉兵擒住斬殺，於是事後蘇家橋的鄉兵聯合梁家角與塘口諸鄉兵前來報仇。[93]

不僅各地鄉兵可能因各種因素互相仇殺，在居鄉時由地方士紳所召募的鄉兵組織，還可能引發階級矛盾。例如松江府轄下的新場鎮，有三位生員號招義盟，名爲「懷忠社」，遠近居民來者不拒，卻不允奴僕參加，於是有張回等六十人心懷不平，推葉宅家的紀綱僕康三爲首，殘殺舉人朱襄孫與其兄弟子姪。所以曾羽王嘆云：「大亂歸鄉，此不易之論。如大清兵破松，在城者悉遭屠戮，

91 〔清〕曾羽王，《乙酉筆記》，頁 13。
92 〔清〕姚廷遴，《歷年記》，頁 58。
93 〔清〕姚廷遴，《歷年記》，頁 58。

而鄉居者不及矣。然在鄉又宜以安靜爲主」。[94]像是這三位生員大肆號召組織義軍，卻遭其奴僕反噬，就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浙江海寧人陳確（1604-1677）撰有七言古詩〈鹽州篇〉，詩裡也生動地描繪出明清鼎革之際的義軍與奴變所造成的社會失序：

> 崇禎末年弘光元，世亂民愁不可言，處處鄉兵能殺人，青天白日魂號冤。貧兒驟飽富兒餒，兇人久活善人死。吾邑鹽官親見聞，大第高門盡爐煨。義軍百萬真貔貅，焚家劫藏勇赳赳，一旦驕兵千騎來，甲士雲散衣冠愁。昔日承平風俗惡，鄉官豪橫恣群僕，沿郵撲捉吏不呵，須臾出反悲今昨。紛紛報復總成虛，大家小家同歸無，朝攫千金暮殺軀，嬌妻掩哭□兒驅。嗟哉世人宜稍悟，今不一悟無乃愚！[95]

小市鎮不但是鄉村聚落的中心，也是鄉兵組織的基地，一旦清兵來報復，馬上就成爲眾矢之的。例如太倉州的沙溪鎮，自從該鎮的烏龍會組成的鄉兵於閏六月十五日攻太倉城失敗後，鎮上「民情大懼，攜妻子走者遍市」。[96]《研堂見聞雜記》的作者也是急著雇用小艇，遷眷屬到鄉村七都的友人宅中，因爲他擔心清軍必定會追剿到沙溪鎮上。到了隔日，作者見到鎮上民情更急，風聲鶴唳，各飽飯以待，若一有警便要逃離。忽有人在市街上大叫清兵已到，合鎮人民奔走，人如山海湧至。待作者離鎮較遠時才知是謠言，不過，當天夜裡，鎮上人民皆已奔走四竄，藏身於鄉間之小屋。此後，鎮民白天守在家裡，晚上到鄉間居住，家裡一人做飯，一人伺門，吃完飯後，即刻鎖門，立於通衢以望。[97]可見沙溪鎮上的居民，仍是緊張害怕。

除此之外，因爲經濟力量興起的江南小市鎮，鎮上居民往往有許多是從商致富者，更成爲清軍勒索的對象。當姚廷遴避難在離周浦鎮北六、七里的地方，雖然安全，但不時仍必須到鎮上採買必需品。一日他到鎮上購物，忽聞全鎮關

---

94 〔清〕曾羽王，《乙酉筆記》，頁 33。
95 〔清〕陳確，《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648。
96 〔清〕婁東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頁 7a。
97 〔清〕婁東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頁 6a-7b。

門聲四起，裂聲震耳，人皆狂竄，直奔鎮外里許，原來是大兵將至。如此驚恐，並非第一次也。他聽說鎮上大戶店鋪湊錢購豬羊與糧食，投見李成楝，呈言周浦鎮居民情願歸順，從此才無兵擾之患。[98]直到隔年，這種現象仍是很普遍。侯岐曾（1595-1647）的日記裡即記載嘉定縣內南翔等鎮的鎮民，一聞清軍將過即風聲鶴唳的情況：

> 〔二月〕初六，〔嘉定縣〕城中人來，知復紛紛竄徙，南翔亦幾效之。居民終宵戒備，止為李督將到吳淞，疑陸路取道故也。凡彼兵所過，托言借鍋造飯，抄掠一空。況南翔、大場諸鎮商賈多擁高貲，傳聞打糧所必不免，宜乎風鶴之易撼也。[99]

至於在江南其他地區規模未若市鎮大的墟集市場，雖然沒有鄉兵組織，卻又成了盜賊覬覦的目標。如陳確在順治三年（1646）冬由海寧花了三天才逃難到海鹽，他寫了一首〈避亂之武原〉詩云：「借宿誰家邨，蒼茫無畔際，云是梅園墟，群盜垂躭視」。[100]

如果逃難是以市鎮爲目的，人身安危的問題可能依然存在，所以仍要逃離到更偏僻的鄉村。曾羽王與姚廷遴二人的經歷，就是最好的說明。曾羽王在閏六月時聽到薙髮令下達之後清兵將前來鎮壓的消息，早已開始計劃逃離所居住的青村鎮，但途中受阻而歸。該鎮民不時聽聞新報，鎮內人或出或歸，靡有寧晷。到七月十五日決定逃往周浦鎮，到了周浦幸賴友人相助，得有安身之地。到八月初突聞大兵去其地只有二十里，於是倉促同妻子往鄉間三里外逃難。[101]周浦鎮人也有不少逃往鄉間者，到八月底九月初時，有清官來鎮上安撫居民，曉諭居民剃髮歸順，地方始有法度。[102]當時姚廷遴也避難在離周浦鎮北六、七

98 〔清〕姚廷遴，《歷年記》，頁 60-61。
99 〔清〕侯岐曾，《侯岐曾日記》，收入《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頁 494。
100 〔清〕陳確，《陳確集》，頁 637。
101 〔清〕姚廷遴，《歷年記》，頁 60-61。
102 〔清〕曾羽王，《乙酉筆記》，頁 20-21。

里的地方，周圍多是大河、危橋與僻路，他料想兵馬應難至其處。[103]

雖然已逃離城鎮，但不代表可以高枕無憂。因爲清兵不但屠城，也會波及到城周圍的鄉村聚落。例如嘉定縣城第二次被攻破後，李成棟聽從浦嶂、浦高二人的建議，決定發兵大搜村落，村中男婦悉用亂草蒙頭，伏於水中，以避其害。數十里內，無安居者。[104]鄉村居民可以說是腹背受敵，一方面要躲避清軍的屠殺，另一方面又得應付土兵的打糧勒索。如《蘇城記變》的作者記載當閏六月十三日蘇州城被陳湖的民兵攻入，燒毀官署之後，作者雖然人在鄉僻，但「風聲鶴唳，無日無之」。[105]一旦有傳言說大兵已到，準備清鄉，鄉裡人們爭覓小艇遠逃。接著作者又記到土兵打糧一事：

> 〔七月〕至二十五日，忽土兵數百統七巨艦罄刦主家，余亦遭池魚之殃。初五日，又金姓一人戎服，同十餘人，手持王某硃票，索粮十石，並擄一船而去。能免於外兵而不能免於土賊，殆亦数不可逃也。[106]

到了八月初五日，又沸傳清軍將洗蕩陳湖，凡三十里內將剿滅無遺，於是村人「復相率爲五湖之游」，作者無奈只好與村中無舟者數家束手待斃，眞度刻如年也。至初八日，流言始息，避去者仍各返回，作者始有更生之幸，然而「膽亦爲之破矣」。[107]《海虞被兵記》的作者也描述他逃到常熟縣城外鄉村，仍要擔心許多事：

> 〔常熟〕十七日早，城中又有訛言，予匆匆出南關入鄉。鄉間每夜防打糧，扁舟貯兒女，窜窜入蘆葦中，而老人獨倚茅簷，望渡頭鬼燐熒熒然。東方將白，而蘆葦中人乃歸。滿頭皆風雨也，以致盡室患瘧不休。[108]

---

103 〔清〕姚廷遴，《歷年記》，頁 60。
104 〔清〕朱子素，《東塘日劄》，卷 2，頁 4a-4b，總頁 509-510。
105 〔清〕佚名，《蘇城記變》，頁 401。
106 〔清〕佚名，《蘇城記變》，頁 402。
107 〔清〕佚名，《蘇城記變》，頁 403。
108 〔清〕佚名，《海虞被兵記》，頁 2b。

作者又記一日有船艦來，兵圍作者鄰居張望雲家，人們走匿草間，等舟去後，才從叢竹水草中蠕蠕而起。[109]一日又傳言有兵來擒其族甥金四，嚇得他四處躲避。[110]

四、浩劫後的城市

這段時期的戰事對江南的城市造成嚴重的破壞，然而戰後的城市要經過多久的時間才能恢復秩序？逃出城市的難民多久才能回到城市？城市內的秩序又是如何恢復呢？這是過去較爲人所忽略的一面。江南各地抗清的戰事，從閏六月初開始持續到八月底、九月初，大致要到九月底江南才大事抵定，官府開始著手招撫，至此才有難民陸續回城。戰後的城市已是一片殘破的景象，只是不同的城市受創程度略有不同。

蘇州城的景象算是受創較輕者，又有總督巡撫等高官與軍隊駐守，所以城內的社會秩序恢復較早。許多原來住在城市裡的家眷離城避難，清官府逐漸開城允許城內居民出城偕同家眷進城。先是在閏六月二十七日要求城中居民欲往鄉村領眷者，必須具一揭及四鄰保結，稟明官府，再由官府給黃旗一面作爲准許通行的證明。當日領旗下鄉者如市。到了二十九日，放領旗下鄉者入城，「歸來婦女，皆面容失色，衣履狼狽。可憫也！」[111]到七月初九日，官府重新規定領家眷入城者，不復用旗，只用報單一紙，備寫姓名、籍貫、左右兩鄰，本圖現總及所領男女者幾口，赴縣簽朱用印，付官府爲照。入城時，根據報單內容所載一一點名進城；爲防奸細混入，所以未帶婦女者不放入城。[112]

---

109 〔清〕佚名，《海虞被兵記》，頁 7a。

110 〔清〕佚名，《海虞被兵記》，頁 7a。除此之外，到了順治三年江南大勢已定後，有時在鄉還會有胥吏、衙役來騷擾，以催討錢糧或里甲錢爲名，來行敲詐之實。如葉紹袁的日記裡記有一日，「忽二諜來緝江邑人，索里甲錢。非眞虜也，即邑隸胥耳，可恨如此！」參見〔清〕葉紹袁，《午夢堂集》，頁 954。

111 〔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頁 213-214。

112 〔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頁 215。

而戰後蘇州城廂的景況，據《啓禎記聞錄》的作者自稱他自六月十四日以來，皆未出城已四十多天；到了七月二十六日步出閶門，只見過去喧鬧之地只存敗瓦頹垣：「市廛中燒盡，□檐僅存。自釣橋西去，勾獄巷、南濠街，南城下，直過新開河橋，皆然」。次日，他步出胥門，看到「月城內亦皆燒盡，外城驛前，光景蕭然」。直到九月二十九日，他到葑門所見：「飲馬橋畔民居悉燬，楊山太廟港口傷去數十家，月城內不存一椽，城外民房十去四五，大抵觸目傷心也」。[113]《蘇城記變》的作者從八月二十日逃到鄉村後，直到九月九日後聽聞清兵不再殺人，才開始雇舟出門。行近黃石橋時，見到橋基已毀，民居十毀四五；至安利橋，見到市廛俱毀；等到達自己近葑門的故居時，「已作瓦礫場矣」。[114]他從蘇州城內到城外所見的情景，且看他的描述如下：

> 初進葑關城外，靡有廬舍存者。進城至詹橋一帶，則完燬相半。西行直達金閶，見長洲縣署及府署止燬其外郛，吳縣署如故，所經居民盡無恙，此地何幸而獨安全；然行人稀少，市井蕭條，大非曩時景象矣。至專諸巷，覓俗兄居；兵戈變故後，見之欣喜欲狂，詢知西城賴周子靜力為緩頰，又有長安三勇士在城上，率其屬殪城外数人，土臺〔按：土國寶〕信其果非叛黨，一方得以保全。兄又床頭金盡，姑應執殳守陴之役，取升斗作糊口計，苟延至此。……閶門月城內，俱遭烈焰，較葑門尤甚。南濠上、下兩岸，自吊橋至康履橋，不存一瓦一椽，目睹為之心惻。由康復橋南，若有默佑者，祝融為之斂威。[115]

這段文字透露出蘇州城內的倖存者，正是靠降臣的維護，以及市民組織的義軍助清守城，才得以保全。作者的「俗兄」也是靠著幫忙守城而得升斗以糊口。

嘉定城在第一次屠城後，清兵撤退，七月初十日時，「士民倖脫者，絡繹入城，見室家零落，井里蕭條，無不放聲大哭。十四日，……爾時人心搖搖，

113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6，頁 6b-7a。
114 〔清〕佚名，《蘇城記變》，頁 406。
115 〔清〕佚名，《蘇城記變》，頁 10b-11b。

日聚街頭，聽不根之語，莫敢寧居」。[116]江陰縣城的情況，自八月二十一日城破到九月二十九日之間，經過屠城後累日天雨，遍地屍骸暴露，滿地堆積。八月二十五日兵退，有士民逃於外者歸城，「見家徒焦壁，路盡填屍。昏黑中隱隱有號哭聲、喊殺聲，初不辨其爲人鬼也。至如露宿啼饑種種慘情，不可勝道。每於荒田野草間，拾穗養生，掩臭行路」。城陷之初有士紳黃毓祺等與勇士殺出東門而逃，於九月初歸城，與眾人搬移街巷屍體，有數萬不獲殮。舉大街、中街、南街火化之後埋於祝塘，名爲「萬骨塋」。諸巷內之屍體隨處火化掩埋，比起萬骨塋要多出數倍。還有自焚死者埋於君山義塚。「更有屍腐交并，骨積成堆者，即堆土使高，或丘壟、或山、或野岸，不勝數」。[117]《江上孤忠錄》的作者趙曦明稱至九月二十九日因各方招撫勤切，所以不得已歸城。然而，「凡紳衿士民陸續歸城，見家徒焦壁，露宿宵啼慘景，或人或鬼號哭之聲，晝夜不絕」。作者嘆曰：

> 可憐江陰城，殺得閉門絕戶，不得寸著者，十之七八。被火燒光，僅存瓦礫者，十之三。清軍擄掠於前，武進人抄搶於後。[118]

又如松江府在八月初三城破之後的景象，據《乙酉筆記》的描述如下：

> 其破城之初，由郡東察院延燒至秀野橋，大街東西之房，百無一存者。城中東南一帶，悉為官兵所占。後卒為成棟之兵所拆，鄉紳之樓臺亭榭，盡屬荒邱。此吾郡房屋過華，宜有今日之劫也！吾松城雖狹小，不及吳郡之三，然東西南北，非官家櫛比，即商賈雜居，市物列陳，無一隙地。所謂錦繡江南，無以逾此，及遭殘毀，昔日繁華，已減十分之七。[119]

上述僅是部份的例子，還有不少江南的城市遭此役摧毀，就像引文的形容，所謂錦繡江南的昔日繁華，如今已減十分之七矣。

116 〔清〕朱子素，《東塘日箚》，卷 2，頁 3b，總頁 508。
117 〔清〕季承禹，《澄江守城紀事》，收入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頁 90-91。
118 〔清〕趙曦明，《江上孤忠錄》，頁 12a。
119 〔清〕曾羽王，《乙酉筆記》，頁 14。

明代中期以後江南城市經濟的繁榮景象，經此役後一蹶不振。即使如受創較淺的蘇州，一時也都難以恢復。尤其是由閶門往西到楓橋的河道南北兩岸，在明代商業興盛，人口稠密；北岸有下塘街，南岸有上塘街，南岸尤爲繁盛。不過，這一帶到了清初，因爲遭到兵災，所以盛況不再。直到康熙後期才恢復舊觀。[120]

五、逃難的社會、心態與文化史分析

官僚鄉紳的逃難與社會矛盾

前述在明清鼎革之際，官紳巨室往往是最先計劃逃離城市的一群人。在此再舉南京與蘇州二例。清軍渡江時，留在南京城內住在忻城伯趙之龍宅邸旁的姚文熺（1623-1680），在其《明季日記》記載五月十日晚，忻城伯下令兵馬圍住其宅邸周圍，不許百姓開門；夜裡卻聽到人馬之聲，五更時聽見街上人喊皇帝走了，原來前晚趙之龍安排家眷出城避難。又記十一日下午還見到劉誠意伯方巾紗褶，騎馬在街上走；到十二日早，便傳說一家都不見了。[121]葉紹袁在《甲行日注》裡也描述南京投降後當時旅居蘇州的友人家屬避難的情形，其中皆是著名的縉紳士大夫之輩：

> 又山左宋、王、謝、李諸進士，左羅石夫人（左名懋第，死節），楚中傅尚書（名淑訓），各乘鄂君青翰之舟，家丁百餘，柘弓妢矢，紅鍪繡袷，載其珍匳寶笥，翠鬟金粉，卜居湖上，棲止廬舍。方以桃源避秦，可忘漢晉，豈僅旌頭毳旃，不問諸水濱也。[122]

上述的記載顯示較有資產的縉紳之家早已收拾家產與眷屬，乘船避居於太湖。

由此可見不少縉紳官員之家順利地逃離城市、成功地避開兵燹，而且逃難的生活比一般人要好。例如葉紹袁當乙酉年清軍佔據吳江後，便於八月二十五

---

[120] 〔清〕佚名，《吳城日記》，頁 104。
[121] 〔清〕姚文熺，《明季日記》，頁 28-31。
[122] 〔清〕葉紹袁，《午夢堂集》，頁 918。

日率其三子，棄家入杭州之皋亭山，薙髮隱遁爲僧，自號桐華流衲，又號木拂。[123]他所撰之《甲申日注》即其逃難的日記，從其內容顯示作者的逃難是有計劃的，且有眾多族人與友人接濟，甚至帶有僮僕。又如明清之際重要的思想家唐甄（1630-1704），當崇禎十年（1637）時，他隨父上任吳江知縣，其後便宦遊各地，並且過著官宦家庭的生活。乙酉年南京城破，唐甄初隨父避難山陰雞山，後遷新昌，寓居於新昌之南洲、沃洲等地。其云：「昔者明之亡也，唐子從其父避于南洲，有田一頃，有圃五畝，有竹延山三里。父食雞豖，奴牧羊耕灌，舂葛獗，將以爲石丁氏也」。[124]由之顯示即使身處逃難在外的情況下，唐甄的家產還是田以頃計，圃以畝計，山以里計，羊以群計。而耕、灌、舂、牧等勞動，也均由奴僕擔任，唐甄本人和他的父親並不直接參加生產而專「食雞豖」。

至於身分較低，財力較有限的士人家庭，在逃離城市的過程中就不如上述的順利。而且他們逃離城市的時間較遲，往往在路途中會面臨市井民眾的壓力。在此以姚文熺爲例，其本籍爲安慶府桐城縣。崇禎十五年（1642）春，桐城縣發生大疾疫，賊兵又來攻城，殺戮四鄉。其父認爲若在城內惟有束手待斃，於是先到安慶府收欠債，再派人接家眷遷往南京。當他們雇車轎要出城時，奈何近日百姓稟官不許人出城，作者大哥只得往求知縣王公。王知縣只好告訴他們明日知縣要出城拜訪將官之時，他們可以跟隨一起出城。當他們隨著縣令出城到了南門大街時，卻被一夥無賴之徒攔住，其中一人說道：

> 平日在城享福，於今反亂，鄉官財主有錢的都搬了去，只丟著我們幾箇窮百姓就是該死的了！快些回去。

123 葉紹袁，字仲韶，號粟庵，又號天寥道人，江蘇吳江人，天啓五年（1625）進士。歷任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後因厭倦政務，以母馮氏年高，陳情養親，終棄官返鄉。葉家原本富裕，終因一生在朝日淺，絕意仕進以後，不事生產，家漸敗落。

124 〔清〕唐甄，《潛書》（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上篇下，〈獨樂〉，頁 88-89。

作者等只得哀求道：

> 我們也是貧士，沒甚東西，不過往樅陽親戚家借住，就外面糧食賤些。若在城內便餓死了，列位何苦攔阻？

最終他們湊出二兩銀給這些人，但才走沒幾日又有一夥人攔住他們要錢。這時他們想到四叔父曾任職湖廣道，城外駐防的楚將應該認得，於是作者的大哥具諫往拜，央求派兩兵護送，楚將也答應要求。他們一家終於離城與其父會合，再坐船到南京三山大街租用陳家樓安頓。[125]這則例子顯示在此非常時期，貧富之間的社會矛盾益加明顯。

虎口餘生後的反思

當時親身經歷逃難痛楚的下層士人，在其所留下的文獻裡敘述自己的逃難過程，同時記錄對時事人物的看法，而相較過去史書的評價往往有很大的差異。他們對鄉兵或義兵的抗清能力不以爲然，而且認爲這些舉動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只會將城居百姓帶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例如《蘇城記變》就批評薙髮令之後陳湖民兵攻入蘇州城內之舉：「力綿算拙，畫虎不成，反至黎元被屠，婦女遭掠，室廬成燼，繁麗吳城罹此慘毒，痛哉」。[126]《海虞被兵記》也批評常熟領導鄉兵抗清的分子，等到清大軍一到，即露出其本質：「匝月而兵到，鄉兵胡欲以一隅抗上游？識者掩口，而其恣意誅殺，搜攫貲財，四境內固已重足立矣。不圖其飄然遁也，魚殃雉罹，使民塗炭」。[127]

他們非常清楚地將抗清的領導人分爲兩類，一類是眞正忠於明朝的孤臣義士，另一類人則是藉口抗清，卻以搶奪資源爲目的的投機分子。就像梅村野史在《鹿樵紀聞》裡指出：「自薙髮令下，而人心始搖，紛然四起。於是前朝孤臣義士，與遠近奸民素懷異志者，借以爲資，紛然四起」。[128]就以松江府的抗清爲例，曾羽王《乙酉筆記》載薙髮令後，兵部侍郎沈猶龍起義守城，黃蜚、

125 〔清〕姚文熺，《明季日記》，頁 19-21。
126 〔清〕佚名，《蘇城記變》，頁 401。
127 〔清〕佚名，《海虞被兵記》，頁 7b。
128 〔清〕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卷上，〈南國愚忠〉，頁 22b-23a。

吳志葵兩總兵駐軍於松江府西南之豆腐濱，以爲犄角。又有侯承祖起義於金山衛城。曾氏批評說：「諸人名爲起義，志在打糧，止指揮侯承祖背城借一，一時偉之」。待遭清大軍擊敗後，黃蜚、吳志葵二人被擒，「哀號萬狀，殊不可問。而松郡屠戮數千人之命，實起於二人之手。其視侯承祖慷慨受刑，固有天淵之隔矣」。[129]親身經歷嘉定之屠而劫後餘生的朱子素，他對守城抗清的侯峒曾與黃淳耀二人，有一段評論：

> 乙酉之變，議者訾侯、黃諸君子忠有餘、智不足，是不然。諸子所殉者，義也。其餘非所計也。況諸君子即不城守，嘉邑亦終被屠，不以罪唱始惑眾輕起兵端者，而諉於諸君子，可乎？特表而出之。[130]

朱子素述及嘉定抗清之舉時並不表贊同，但是並未將城遭屠之過歸咎於侯、黃二人，而是嚴厲批判那些始倡抗清、輕起兵端，卻又半途遁逃之徒。《鹿樵紀聞》裡也是將罪過歸咎於明總兵楊文驄，因爲他妄殺派來蘇州招撫的清朝官員黃家鼐，以致於豫王多鐸大怒，命貝勒以八萬兵下蘇杭，「南國之禍自此始矣」。[131]無怪乎在其他的地區有例子顯示當鼎革之際，有些地方菁英並不歡迎義軍，反而期待與清朝合作。[132]

讓他們更不齒的，則是那些機巧逢迎的官員與士子之行徑。如《蘇城記變》記載當清之刑部侍郎李延齡蒞任，「李公雄踞都察院，孝廉、青衿求官者如市」，作者譏諷此乃「五經掃地矣！」[133]又如吳江縣有沈君晦起兵陳湖，與吳易分別擒獲清之練兵與縣令，但當清軍大舉來襲，二師兵敗，縣裡有許多士紳積極尋

---

129 〔清〕曾羽王，《乙酉筆記》，頁 13-14。

130 〔清〕朱子素，《東塘日劄》，卷 2，頁 5a，總頁 511。

131 〔清〕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卷上，〈南國愚忠〉，頁 22b。

132 Hilary J. Beattie 考察安徽桐城縣的地方菁英時發現，當明清鼎革之際，當地的農民與菁英家族厭惡戰爭的破壞與軍隊的騷擾，而且往往不是叛亂引起反而是明朝的軍隊所爲。所以他們歡迎清朝派來招安的官員，並企望其能恢復法治與秩序。即使在 1648、1649 兩年曾有「義軍」起事，但因爲不受當地人支持而很快地就遭到鎮壓。參見 Hillary J. Beattie, “The Alternative to Resistance: The Case of T'ung-ch'eng, Anhwei,” in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eds.,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56-257。

133 〔清〕佚名輯，《蘇城記變》，頁 400。

求一官半職，葉紹袁記：「吾邑甚有不如其令者，引頸而比屋僇也，士大夫遂推紒以媚焉」。他於是決定計劃出家爲僧，游方外以遯。[134]

亂世中的婦女

在這段期間清軍曾在各地掠奪，而婦女亦成爲其貲財，即使在總督巡撫管轄下的蘇州府城內，也發生有營兵擄婦女，令婦女手執草標於街市發買之事。[135]清廷官員在閏六月底逐漸在各地開始下令讓被擄掠的婦女回歸原家庭。《吳城日記》與《啓禎記聞錄》記載了以下諸例：

> 〔乙酉閏六月廿八日〕向來兵丁擄獲婦女無限，戕害及病死者多矣。至是官令給還完聚，許親屬領去，約有二百餘口。[136]

> 〔乙酉七月十五日〕昆山，因縣令率民守城，抗不相下，發兵往屠，城中多被殺戮。婦女被掠者以千計，載至郡中鬻之，價不過二三兩。土公〔按：江寧巡撫土國寶〕禁民收買，有買者，媒嫗與買主俱被斬。[137]

> 〔乙酉八月十三日〕陳湖水鄉，雖發兵往，其嘯聚者大多遁匿。但多擄獲，猶未得要領。十五日，吳公令〔按：蘇松常鎮提督總兵官吳勝兆〕將所獲陳湖婦女，給還完聚。[138]

此時期地方上被掠的婦女多集中到大城市內當成貨物拍賣，像是揚州被掠的婦女多送到南京，據《明季日記》載：「每日見揚州擄來的婦女進城，一陣數十，後面滿兵持皮鞭趕著，打得可憐，就似趕豬一樣」。[139]而蘇州府轄下縣屬與松江府被掠的婦女則是集中到蘇州，於是南京與蘇州就成了最大的人肉市場。有許多外地的男性到蘇州城內外，張貼尋人啓示：

> 〔乙酉八月廿七日〕（蘇州城內外）路旁各處粘招帖，尋覓妻女者，

---

134 〔清〕葉紹袁，《午夢堂集》，頁 918。
135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5，頁 11a。
136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5，頁 8b；〔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頁 214。
137 〔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頁 215；〔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5，頁 10b。
138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6，頁 3b；〔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頁 220。
139 〔清〕姚文熺，《明季日記》，頁 37。

知昆山於七月七日被屠，太倉於三十日被〔兵〕，松江於八月初三被兵，兵回時多掠婦女賣於城內外，冀破鏡或可復圓，故尋覓耳。亂離之苦乃爾！[140]

這時可以看到一些記載，將這些被擄掠的婦女形容成兩種極端對立的形象：一面是受辱悽楚的樣子，另一面則是嫌貧愛富的模樣。如南京的情況，據《明季日記》載：

我們每日往營內去，看見那些婦女也有蓬頭垢面哭的惱的，還有搽粉搽油頑的笑的。每日也有老子贖女兒的，也有丈夫贖妻子的，還有一個婦人不肯回去，到是那滿兵怒起來纔去了。[141]

又《吳城日記》與《啓禎記聞錄》亦載有一例：

兵丁掠婦在營，有往求覓者，每被殺辱，殆無人理。然亦有一事足紀者：一人知妻被陷，哀泣拜求不已。兵丁喚婦問詢，果厥夫。憫其情切，許令領回完聚。而婦堅不肯行，謂其窘不能養贍。故兵丁憤其忍於弃〔按：棄古字〕夫，即揮刃劈其首，中分至項下。與其夫十六金，使別娶婦。此舉殊快人意。[142]

上述的兩則例子便讓人聯想到王秀楚《揚州十日記》中向清兵獻媚的揚州婦女，以及作者以婦女的貞節與否導致國家淪亡的論述：

婦本郡人，濃抹麗妝，鮮衣華飾，指揮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盡媚態，不以為恥。卒嘗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嗚呼！此中國之所以亂也。[143]

文學史家已指出女子被擄掠在明清之際不但是殘酷事實，也是文學作品中常見的話題（其中也有女性自撰的詩文）。雖然在文學作品中言及被掠婦女的遭遇，

140 〔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中，頁 221。
141 〔清〕姚文熺，《明季日記》，頁 37。
142 〔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上，頁 217；〔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6，頁 1a。
143 〔明〕王秀楚，《揚州十日記》，收入〔清〕留雲居士輯，《明季稗史初編》，頁 470。

引起了廣泛的同情，但亦有譏諷責難的聲音。[144]上述這些逃難士人的親歷，和清初文學作品中關於難女的形象頗有相合之處；雖然文學作品大多是男性文人所塑造或挾帶其男性主觀的論述，但也有相當程度是有所本的，而非憑空杜撰或揣測之言。

劫數難逃？

上述親歷逃難的文獻裡，往往摻雜了許多靈異經驗的紀錄。如《海虞被兵記》記作者其子夢到城中將發生大屠殺，讓作者警覺要逃難一事。又如常州府武進人薛寀，[145]他在筆記中回憶起乙酉年四月初九夕，聽聞南京傳來的種種警報之後，夜裡作了惡夢：

> 夢見鄉居西三間與羣從閑譃，忽聞異聲，若天崩地裂者。須臾木拔礫飛，牆傾柱倒。萬眾奔啼而來，有顛跌血污，肢折額破者。覺後思之，猶慄慄不能自持也。[146]

當時的他正辭官在家，這場夢讓他警覺要計劃逃難。

還有一些文獻裡記載一些未及時逃出城市而遭殺身之禍的故事，其間也出現類似的靈異經驗。如《明季南略》記有一家母子二人，於江陰城破時，其子避於觀音寺大鐘內，入夜後則走歸陪母寢，天未明時即越入鐘中，如此躲過兩天。至第三夜歸時對其母大哭，稱其前兩日見有神明至觀音寺內點名死者，其中未有他，但前天夜裡聽聞神明呼其名在內，故知必死無疑。是夜，同母宿於家，醒時已天明，踉蹌欲越寺卻遇見清兵而被殺。[147]同書又記另一則故事，是一位書吏兩度作夢，一次是神明，一次是其亡祖，先後告訴他同一句話：「汝

---

144 以揚州婦女的形象為例，筆記《揚州十日記》反映出對揚州女子的責難，並聯繫到亡國的恥辱；小說《續金瓶梅》雖以譴責起，卻以比較平恕的視野終結；地方志則表彰了許多揚州死難的烈女。參見李惠儀，〈性別與清初歷史記憶——從揚州女子談起〉，《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卷 7 期 2（2010 年 12 月），頁 289-344。

145 薛寀，字諧孟，號歲星，常州府武進縣人。崇禎三年進士，以刑部郎中，出守開封，旋投劾歸里，明亡後為僧，更名米，別號堆山，著有詩文集若干卷。參見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356-357。

146 〔明〕薛寀，《薛諧孟先生筆記》〔民國十七年（1928）鉛印本〕，上冊，頁 37b。

147 〔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卷 4，〈江陰續紀（難民口述）〉，頁 250。

是六萬七千數內人，何不速歸」。正好當時江陰起兵，士紳將閉城，書吏意欲出城，其父罵其不孝，復欲送其母出城，母亦不聽其勸。書吏以父母皆不欲出城，不得已而止。後全家皆遇難，果然符合其前夢。[148]

可能正是因爲城陷後，城內居民要想逃出城的難度最高，能夠逃離者都有相當的運氣，於是才會出現將某些人未能及時逃離而遭禍的原因，透過這種命中注定的敘述方式，也就是類似命定論的說法，來找到心理創傷發洩的出口。另一方面，又常將能夠在城陷時成功逃離城市的理由，歸因於某些因果報應。如《明季南略》記江陰城陷時，有某家因信奉三官齋，常年茹素，所以當聞城陷時，急走城上，又躍下城垣藏匿於蘆葦內，恰巧得點心一包，得以糊口。三日後清軍封刀，主角才回到城內，家中卻毫無受損，一家七人俱全。人們皆認爲是他們家「茹素之報」。[149]還有的是在避難鄉村期間險遭劫難的例子，如馬世傑在其回憶錄中記載她的姊姊在避難時已遭清軍挾持，但在途中她投身穢廁躲藏，清兵雖欲以戈碎其首，卻在此時屋簷上忽然墜落一破瓦覆蓋她，由此而逃過一劫。馬世傑就歎道：「嗟乎！姊氏之烈與智不必言，而無風墜缶，此中不大有鬼神乎」。[150]此外，他的妻女在避居鄉村時，曾有清軍至其居附近掠殺，卻能倖免於難，其云：

> 吾婦篤信佛，兵兩至，姊氏及衰甥輩咸避去，村居虛無人。婦端坐室中，仗佛耳。女以母在，亦相依不捨。騎兵屢經其戶，皆不入。余涼德何足致此？或果佛之祐耶！[151]

馬世傑把他家人兩度避險的原因，歸諸神佛的保佑。

避城抑或避鄉？

雖然此時期已形成「小亂避城、大難避鄉」之諺，顯示大多數人接受這樣的觀念。本文開頭提到的李漁，他說自己也曾隱居於鄉野，因爲他就認爲：

---

148 〔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卷 4，〈江陰續紀（難民口述）〉，頁 250。
149 〔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卷 4，〈江陰續紀（難民口述）〉，頁 250。
150 〔清〕馬世傑，《孑遺集》，卷 3，〈雜文・記乙酉六月二十六日遇難始末〉，頁 387。
151 〔清〕馬世傑，《孑遺集》，卷 3，〈雜文・記乙酉七月十一日遇難始末〉，頁 389。

> 無論治亂，總是居鄉的好；無論大亂小亂，總是避鄉的好。[152]

明清鼎革之際的江南應該算是大亂，從逃難時實際行動的抉擇來看，雖然也有人猶豫於應該避城或是避鄉，但是當時人的確是以避居鄉間爲主要的考量。例如上一小節曾提到的薛寀，他的惡夢時時出現，「夫予在山在鄉，輒夢變起城邑，在城又夢鄉中如此異兆。然則何所往而可！」於是要避難到城還是到鄉，成了困擾他的大問題。[153]到了五月時他聽聞清軍渡江，「故旬月來，有警報奔竄之苦。茲避亂山中，洶洶不減于城邑」。[154]即使他已經逃離城市，避居山中，但是人心依然動盪不安。

由是當時仍有不贊同避鄉之說，例如《啓禎記聞錄》的作者就對「人皆謂避亂宜居鄉」的看法不以爲然，他以順治三年逃到陽城湖的鄉紳諸家被盜劫之事爲例：

> 丙戌。四月初八日，陽城湖諸大家被刼，人皆謂避亂宜居鄉，有鄉紳蔣韜仲、客官劉光斗、及富翁王養和之子，俱寓陽城湖之濱，家擁重貲，寇盜垂涎。先令人傳語，若各家肯湊萬金助餉，更不相犯。各家猶豫莫肯應，至是遂肆刼掠，滿載而去，所失豈止萬金，但不傷人耳。居鄉可危始〔按：一作「如」〕此，人何競趨於鄉耶？[155]

接著他又總結明清鼎革之際，人們廣泛地認爲避鄉爲宜的觀點是可議的：

> 自申酉變革，人咸以居鄉為便。光福、玄暮等處，卜居寄跡者，挾貲而往。寇盜多行刼掠，鄉村復苦不寧。丁亥四月下旬，撫公發兵下鄉，名為剿寇，□逋，將卒惟在地方殺人掠財，皆滿載而歸。[156]

總而言之，居鄉不但會面臨盜賊的覬覦，又可能因清軍以剿寇之名而遭殺掠。所以當清軍平定江南抗清運動之後，即使城市已殘破不堪，但仍比鄉間要安全。像是陳確最終還是逃到清軍佔領下的海鹽縣城，雖見「胡馬塞街巷，胡

---

152 〔清〕李漁，《十二樓》，卷 12，頁 244。
153 〔明〕薛寀，《薛諧孟先生筆記》，上冊，頁 37b。
154 〔明〕薛采，《薛諧孟先生筆記》，上冊，頁 39a。
155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7，頁 1a；〔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中，頁 225。
156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卷 7，頁 6b；〔清〕佚名，《吳城日記》，卷中，頁 230。

兵滿城闉，區區百夫長，氣勢何巍尊！」但也歎道：「乾坤方翻覆，愼勿輕其身」[157]，生命誠可貴也。

結　論

晚明不少江南地主士紳以經濟因素而遷居城市，明末則是爲了安全的原因而遷居至城內，至北京陷落後又改爲遷往城外鄉間避難。弘光朝的成立使江南曾有短暫的穩定，直到清兵南下，逃難潮再起。至此看到城鄉二者的地位徹底倒轉，城居住民逃難得到鄉間依親，過去驕傲的態度不再，城市地位已不如鄉村。清軍南下原訂採取和平招撫，但是薙髮令的下達之後，引起各地抗清運動紛起，城市住民又開始第三波，也是最大的一波逃難潮。「小亂避城，大亂避鄉」的諺語於此際形成，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然而，避鄉之後卻不見得能夠安全保命，而是面臨腹背受敵，一面是清軍清剿的威脅，一邊是土兵打糧的騷擾。到了順治三年以後，清廷皆已將江南各地城市的反抗運動平息，城市相對於鄉村更安全，城市在一般人們心中地位有逐漸恢復的趨勢。無論這場戰役是誰勝誰負，無辜的百姓才是最大的輸家。

本文所引用的文獻之各作者，大多是明清之際城居的士人，他們不同於那些早已計劃並且事先已成功地避居他處的官紳，因爲他們有親歷逃難的經驗，所以從他們的著作中，反映出當時許多社會、文化與心理的面相。藉由他們的逃難紀錄，讓我們擺脫了明清之際的歷史大敘事，呈現出當時戰亂下「逃難社會」的特色。在他們逃離城市的過程中，面對市井小民的勒索，反映出貧富階層之間社會矛盾的激化。逃難與流離的經歷，更讓他們反思江南抗清的意義。他們對鄉兵或義兵的抗清作用不以爲然，他們將清軍屠城歸咎於少數始倡抗清、輕起兵端，卻又半途遁逃之徒；而對於眞正有心守城的忠臣並不苛責。他們眼見被擄掠婦女的悲慘遭遇，但同時又看到有婦女嫌棄丈夫貧困而獻媚於清

[157] 〔清〕陳確，〈朝入城東門〉，收入《陳確集》，頁 638。

兵的景象。他們嘗試爲逃難流離之間的苦難與死亡找到心理宣洩的出口，於是留下許多靈異的描述與因果報應的故事。雖然在當時大多數人都同意應該要避難到鄉村，不過鄉村是否眞的安全，也引起疑慮。所以是避城抑或是避鄉？在當時仍然存在著爭議性。

進入二十世紀以後，中國仍是內憂外患不斷，而江南地區城市居民的逃難路線與目的地，與明清之際的情景如出一轍。例如抗戰初期蘇州城內居民紛紛逃出城，以通往西鄉太湖口木瀆、光福的蘇福公路最爲擁擠。蘇州轄屬縣城的居民也掀起逃難潮，如崑山城內的居民集中逃往南鄉的市鎭，如甪直、張浦、茜墩等地，可見鄉間的市鎭仍是逃難人重要的目的地。西鄉的光福鎭在明清之際就是逃難人的聚集地，抗戰時期更聚集了難民近二十萬人，晚上盜賊四起。到 1938 年初，因爲鄉間土匪越來越多，散處僻遠鄉鎭的逃難人只得回城，有的則往上海安身。[158]上述蘇州的例子，讓我們看到歷史脈絡的延續。

158 王國平主編，《蘇州史綱》（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9），頁 523-528。

徵引書目

一、史料

〔明〕方岳貢修，〔明〕陳繼儒等纂，《（崇禎）松江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卷 7，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崇禎三年（1630）刻本影印，1991。

〔明〕王秀楚，《揚州十日記》，收入〔清〕留雲居士輯，《明季稗史初編》，上海：上海書店據商務印書館 1936 年 12 月初版本影印，1988。

〔明〕薛寀，《薛諧孟先生筆記》，上冊，民國十七年（1928）鉛印本。

〔清〕王昶，《（嘉慶）直隸太倉州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69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嘉慶七年（1802）刻本印行，1997。

〔清〕朱子素，《東塘日劄》，收入周光培編，《清代筆記小說》，冊 12，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清〕朱子素，《嘉定縣乙酉紀事》，收入〔民國〕孫毓修編，《痛史》，冊 8，台北：廣文書局，1968。

〔清〕佚名，《江南聞見錄》，收入留雲居士輯，《明季稗史初編》，上海：上海書店據商務印書館 1936 年 12 月初版本影印，1988。

〔清〕佚名，《海虞被兵記》，收入于浩編，《明清史料叢書續編》，冊 16，《虞陽說苑》甲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清〕佚名，《啓禎記聞錄》，收入〔民國〕孫毓修編，《痛史》，冊 5、6，台北：廣文書局，1968。

〔清〕佚名，《蘇城記變》，收入于浩編，《明清史料叢書續編》，冊 18，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清〕佚名，《吳城日記》，收入甘蘭經等點校，《丹午筆記・吳城日記・五石脂》，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清〕吳學濂纂修，《（乾隆）溧陽縣志》，收入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據清乾隆八年（1743）刻本影印，2011。

〔清〕李漁，《十二樓》，台北：三民書局，1998。

〔清〕季承禹，《澄江守城紀事》，收入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清〕侯岐曾，《侯岐曾日記》，收入《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清〕俞樾，《春在堂襍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550-155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刻春在堂全書本影印，1997。

〔清〕姚文熺，《明季日記》，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清鈔本。

〔清〕姚廷遴，《歷年記》，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
〔清〕唐甄，《潛書》，北京：中華書局，2009。
〔清〕徐鼒，《小腆紀傳》，台北：學生書局，1977。
〔清〕馬世傑，《孑遺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抄本影印，2010。
〔清〕婁東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收入〔民國〕孫毓修編，《痛史》，冊 10，台北：廣文書局，1968。
〔清〕曹煒，《庵村志》，收入趙詒琛、王大隆輯，《甲戌叢編》，台北：世界書局，1976。
〔清〕梅村野史，《鹿樵紀聞》，收入〔民國〕孫毓修編，《痛史》，冊 3，台北：廣文書局，1968。
〔清〕陳確，《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
〔清〕陸世儀，《志學錄》，收入劉家平、蘇曉君主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冊 27，北京：線裝書局，2003。
〔清〕曾羽王，《乙酉筆記》，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清〕葉紹袁，《午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清〕漫遊野史，《海角遺編》，收入于浩編，《明清史料叢書續編》，冊 16，《虞陽說苑》甲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清〕趙曦明，《江上孤忠錄》，收入〔民國〕孫毓修編，《痛史》，冊 8，台北：廣文書局，1968。
〔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690-169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鄧氏南邨艸堂刻本影印，1997。
〔清〕錢林，《文獻徵存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54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咸豐八年（1858）有嘉樹軒刻本印行，1997。
〔清〕韓菼，《江陰城守記》，收入徐華根編，《明末江陰守城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清〕蘇瀜，《惕齋見聞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 26，上海：上海書店據丁丑叢編本影印，1994。
〔清〕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收入《涵芬樓秘笈》，第二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
周關東主編，陶繼明、葛秋棟選注，上海市嘉定區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嘉定抗清史料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二、專著

王成勉，《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2012。
王國平主編，《蘇州史綱》，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9。

巫仁恕，《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閑消費與空間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南炳文，《南明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

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謝國楨，《晚明史籍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Brook, Timothy.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Dennerline, Jerry. *The Chia-ting Loyalists: Confucian Leadership and Social Chan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Idema, Wilt L., Wai-yee Li, and Ellen Widmer, eds.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Smith, Joanna Handlin. *The Art of Doing Good: Cha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Struve, Lynn A.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Struve, Lynn A., ed. *The Ming-Qing Conflict, 1619-1683: 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 Guide*.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8.

Struve, Lynn A., ed. *Voices from the Ming-Qing Cataclysm: China in Tigers' Jaw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Wakeman, Frederic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三、論文

王汎森，〈清初的下層經世思想〉，收入氏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 332-368。

李惠儀，〈性別與清初歷史記憶──從揚州女子談起〉，《台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卷 7 期 2，2010 年 12 月，頁 289-344。

李惠儀，〈明末清初流離道路的難女形象〉，收入王璦玲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台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頁 143-186。

岸本美緒，〈崇禎一七年の江南社會と北京情報〉，收入「明清時代の法と社会」編集委員会編，《和田博德教授古稀記念・明清時代の法と社會》，東京：汲古書院，1993，頁 347-364。另收入：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 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頁 145-157。

森正夫，〈一六四五年太倉州沙溪鎮における烏龍會の反亂について〉，收入明清史論叢刊行會編，《中山八郎教授頌壽記念・明清史論叢》，東京：燎原書局，1977，頁 195-232。

黃一農，〈官方與民間、史實與傳說夾縫中的江陰之變（1645）〉，收入陳永發主編，《明清帝國及其近現代轉型》，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11，頁 131-202。

Beattie, Hilary J. “The Alternative to Resistance: The Case of T'ung-ch'eng, Anhwei.” In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eds.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39-276.

Struve, Lynn A. “Confucian PTSD: Reading Trauma in a Chinese Youngster’s Memoir of 1653.” *History & Memory*, 16:2 (Fall/Winter 2004), pp. 14-31.

Abandoning the Cities: The Flight of Literati and Merchants from Jiangnan Citie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Wu Jen-shu*

Abstract

According to a traditional idiom, "In times of minor disorder, flee the cities; in times of major disaster, flee the countryside." This phenomenon appeared in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reflecting not only the ravages of war but the awarenes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Past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is period has concentrated on major political events, but the experiences of refugees have been neglected. This article uses the notes and diaries of literati from Jiangnan cities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flight. While may gentry had moved their residence from the country to the city from the mid-Ming period on, this trend was reversed at the end of the Ming. The status associated with urban residence disappeared, and many literati experienced the distress of flight.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such issues concerning flight as its social contradictions, women's encounters, survivors' perceptions of the loyalist leadership, and the different fates of refugees through the lenses of social history, mentality studies, and cultural history. This article challenges the narrative of the macro-history of Ming-Qing transition and describes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a society in flight.

Keywords: Ming-Qing transition, Jiangnan, flight, city, country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